

论文选刊

日本的汉语史研究之历史与现状 ——兼论中日学术交流对汉语史研究的重要作用

陈东辉*

[提 要] 日本学者在汉语史研究领域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在不少方面甚至超过了中国学者，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本文结合作者在日本大学中文专业任教三年的体会，从五个方面论述了日本的汉语史研究之历史与现状，以及中日学术交流对汉语史研究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 汉语史；训诂学；音韵学；文字学；日本汉学；中日文化交流

本文结合作者在日本大学中文专业任教三年，以及多次参加日本中国学会、日本中国语学会、日本中国近世语学会、日本训点语学会年会的体会，从以下五个方面论述日本的汉语史研究之历史与现状，以及中日学术交流对汉语史研究的重要作用。

第一，除了中国本土之外，日本的汉语史研究者是世界上最多的，约有数百人。

* 陈东辉 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副教授。

他们基本上在各所大学从事汉语教学，但他们研究的内容几乎涉及汉语史研究的所有领域，在音韵学、方言学、中古近代汉语词汇和语法、佛经词汇、古文字学以及中日汉字词比较等方面均有突出的成绩，乃日本汉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学者关于汉语史研究的成果，在不少方面甚至超过了中国学者，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

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早稻田大学、庆应大学、大阪市立大学、大东文化大学、关西大学、花园大学、南山大学、北海道大学、东京外国语大学、京都外国语大学、神户市外国语大学等是日本汉语史研究者较为集中的大学，科研成果较多，水平较高。

日本的汉语史研究者十分注重研究的基本工作。在从事某一项研究之前，他们常常亲自动手编制索引、目录、资料汇编等工具书，太田辰夫、波多野太郎、入矢义高等德高望重的日本汉语史学家都编过这类工具书。在研究风格上，日本学者重考证，重视细小及别人不太注意的问题，并在论著中注重列举大量的材料来说明问题，颇有乾嘉遗风。如河野六郎的《朝鲜汉字音の研究》¹之正文共计 210 多页，而附录资料表达 240 多页；大岛正二的《唐代字音の研究》²除了正文一册之外，另有《资料索引》一册；平山久雄的《敦煌毛诗音残卷反切の研究》，也运用大量字表证明自己的论点。有时在中国学者看来很小的一个论题，日本学者也写成了一本厚厚的专著。然而应该指出的是，虽然日本汉语史研究者从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乾嘉学派在治学方面的不少优良传统，但是他们并不仅仅局限于此。他们普遍重视对外交流，对中国内地、台湾、香港、韩国以及欧美等地出版的汉学论著十分关注，信息灵通，加上经济条件远较中国内地学者优裕，所以有条件大量购买此类书籍，与自己专业相关的论著几乎竭泽而渔。同时，他们一年中可多次去国外，或合作研究，或讲学，或参加学术会议，或查阅图书资料。此外，许多日本汉语史研究者（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学者）还掌握多国外语。笔者在日本任教期间，曾接触过多位青年汉语史研究者，他们除了精通汉语之外，还掌握英、法、德、韩、俄、西班牙等国语言中的一门或数门。上述种种，大大开阔了他们的研究视野，促进了日本汉语史研究的发展。

日本学者在训诂学及古汉语语法学（尤其是近代汉语词汇、语法）研究领域成绩卓著。太田辰夫、香坂顺一、入矢义高、波多野太郎堪称这一领域的泰斗。太田辰夫

1 载《河野六郎著作集》卷二，日本平凡社，1979年。本文在论及日本学者的有关汉语史论著时，凡遇到书名或篇名中的の、と等简单明了的日语假名时，根据原文照录；遇到较为难懂的日语时，则译成汉语。书名或篇名中的汉字，一律依照中国简化字书写。

2 日本汲古书院，1981年。

在汉语史方面的成就以近代汉语语法最为突出,著有《中国语历史文法》³、《中国语史通考》⁴、《中国语文论集(语学篇·元杂剧篇)》⁵、《(改订)中国语古典文法》等,其中前两种被译成中文出版后,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经常被有关汉语史研究论著引用。此外,他还编有《中国历代口语文》。太田辰夫的论著论证严密,用例审慎,资料详赡,结论精当。以《中国语史通考》为例,该书收录了他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所发表的与汉语史(主要是语法史)有关的论文,既有像《上古汉语略说》、《唐代文法试探》这样的通论性论文,又有如《〈老乞大〉的语言》、《〈儿女英雄传〉的副词》之类的论文。诚如该书中译本的“内容提要”所云:“著者对于每个历史时期的语言现象的研究与发掘,均以对专书的语言研究为坚实的基础。”《中国语历史文法》初版于1958年,深入研究了汉语发展史中与现代汉语语法有直接关系的语法问题,尤其是对唐代至清代的语言现象作了非常细致的描写,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有不少精辟的论断,堪称近代汉语语法史的开创之作,至今仍是研究汉语语法史(尤其是近代汉语语法史)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参考书。

香坂顺一长期致力于明清时期汉语词汇的研究,《白话语汇の研究》、《水浒语汇の研究》、《〈水浒〉语汇と现代语》收录了他的主要研究成果。《水浒语汇の研究》乃其多年研究近代汉语的力作之一,对《水浒》中的600多个虚词逐个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科学的分类、细致的描写、简洁的历史比较,分为代词、副词、介词、连词和助词五个部分。该书参照《水浒》的各种版本,广泛吸取了中国、日本汉语学家的研究成果,是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近代汉语理论著作。此外,该书还可以作为近代汉语虚词工具书来使用,具有很高的使用价值。《〈水浒〉语汇と现代语》则联系现代汉语,对《水浒》中的实词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并作了简洁的历史比较,以揭示出从近代汉语到现代汉语实词的演变规律,在词汇史研究方法论上具有重要价值。此外,香坂顺一还于1961年组织了清末文学言语研究会(1962年改称明清文学言语研究会),发行会刊,并在会刊上连载《近世语札记》。这个研究会后来发展为日本中国近世语学会⁶,如今拥有会员百余人,每年举办一次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会刊《中国语研

3 蒋绍愚、徐昌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2003年出版修订译本。

4 中译本名为《汉语史通考》,重庆出版社,1991年。

5 收录《近代白话文学的训诂学的研究法——以儿女英雄传为中心》等22篇论文。

6 日本所谓的中国近世语或近代汉语,是指明清时期的汉语,与中国学术界所谓的近代汉语的概念有所不同。

究》，成为日本两大汉语研究团体之一（另一个是日本中国语学会），为日本近代汉语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波多野太郎曾任日本中国语学会理事长。他曾在《横滨市立大学论丛》上连载《中国小说戏曲语汇研究提要》。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他编了大量与训诂学研究有关的资料丛刊和索引等工具书。他所编的《白话虚词研究资料丛刊》，收录江户时代以来日人编纂的诠释中国小说、戏曲、诗歌中的白话虚词的著作。同时，他还编有《中国语学资料丛刊》、《中国文学语学资料集成》、《中国方志所见方言汇编》、《吴下方言考索引》等。此外，他于 1960 年发表的《增订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读后》一文，高度评价了蒋礼鸿所著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称颂该书是“研究中国通俗文学的指路明灯”。

入矢义高亦系近代汉语研究的权威学者，其成果以单篇论文和译注为主。他早在上个世纪 40 年代就发表过《关于近代俗语辞典编纂的资料》等论文。他有《洛阳伽蓝记》等译注，另外还编过《〈敦煌变文集〉口语语汇索引》等。他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和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所撰写的书评，曾经在日本和中国训诂学研究界产生过重要影响。

牛岛德次所著的《汉语语法论》，分为《古代编》和《中古编》，引用了《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宋书》、《南齐书》、《世说新语》等典籍中的大量材料，说明了古代和中古汉语的结构，具有重要价值。其中《中古编》还附有 1970 年之前中日两国汉语语法研究的重要论文目录和有关索引。此外，他还著有《日本中国语语法研究史》⁷。该书是第一部研究内容较为系统和全面，考察时间较长的日本汉语语法研究史专著。

日本中青年一代的学者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的优良传统，在训诂学及古汉语语法学领域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佐藤晴彦主要从事近代汉语的研究，尤其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三言》中的哪些作品为冯梦龙的创作。他将最普通的常用词汇、语法作为断代的标准，而不是以很难懂的特殊词汇作为断代的标准。因为他认为特殊词汇数量少，而且容易被有意地模仿。这是很有见地的，值得训诂学研究者思考。

盐见邦彦在唐代俗语词研究领域取得了重要成绩，他的论文集《唐诗口语の研究》⁸，包括《唐诗俗语新考》、《全唐诗“户”考》、《全唐诗“市”考》和《唐代の“夜市”》

7 中译本名为《日本汉语语法研究史》，甄岳刚编译，杨学军校订，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 年。

8 日本中国书店，1995 年。

等论文。

志村良志的专长是中古汉语语法，同时对汉语音韵学及词汇学也有较深的造诣。他主张在有限的资料中，调动一切手段，来探明各式各样变动着的语言现象及其内在的变化规律。他往往把语法问题跟语音和词汇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故其论著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结论也大体稳妥。其名著《中国中世语法史研究》⁹分为“中世汉语的语法和词汇——概论”、“专论”两个部分。他在该书中指出，汉语史上的中世时代，或称“中古汉语”，就整体而言有其自身的统一性，相对于它前后的时代，可以说显示出被充分认可的特殊性。中古汉语与前代的上古汉语有明显区别的特征，同时作为近代汉语中发达的各种倾向的先驱，近代汉语中也多少保留着一些中古汉语的要素。中古汉语意外丰富地包含了现代汉语仍通用的语言现象的主要点，在音韵、语法、词汇各方面，都可以找到不少现代汉语的祖型乃至原型，从这一意义上也可以说，中古汉语形成了汉语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该书乃著者多年研究汉语语法史的成果，考证精细，引例非常丰富，并在附录中详述前人观点，甚便读者。正如小川环树在该书的“序”中所指出的那样：“由于他充分把握了这个时期的语法史的全貌，才能写得这么好。”

同时，森野繁夫等编纂的《六朝古小说语汇集》、藤井守编纂的《三国志语汇集》和《三国志裴氏注语汇集》、星斌夫编纂的《中国社会经济史语汇》和《中国社会经济史语汇续编》、日本宋代以来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语汇研究班编纂的《明清时代社会经济语汇索引》等专门词汇集，对训诂学亦颇有用处。此外，森野繁夫还发表了《简文帝的诗中所见到的“自”——以“本自”为中心》、《六朝汉语の疑问文》、《六朝汉语の研究——关于〈高僧传〉》、《六朝汉语の研究——以〈与平原书〉为例》、《六朝译经の语法》、《六朝译经の语汇》、《六朝译经の语法と语汇》等一系列关于中古汉语词汇、语法研究的论文。辛岛静志发表了《〈长阿含经〉の原语の研究——以音写语为中心》、《汉译佛典の汉语と音写语の問題》、《汉译佛典的语言研究》和《汉译佛典的语言研究（二）》，伊藤丈发表了《六朝汉译佛典の语法その一“将+否定词”》和《六朝汉译佛典の语法その二“了+否定词”》，西谷登七郎发表了《六朝译经语法の一端》，佐藤利行发表了《六朝汉语の研究——王羲之の书翰の場合》、《六朝汉语の研究——东晋·王献之の书翰の場合》和《六朝汉语の研究——西晋·陆云の书翰の場合》。

9 日本三冬社，1984年；中译文由江蓝生、白维国译，中华书局，1995年。

在国外汉语史学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音韵学往往是其强项。因为国外学者研究汉语史，首先必须过语音这一关，所以一般都在音韵学方面投入大量的精力。有些学者学习与研究了音韵学的基础知识之后，投入到汉语史研究的其他领域；另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进一步深入研究音韵学，最终成为音韵学专家，从而促进了国外音韵学的繁荣与发展。日本也不例外，音韵学乃日本汉语史研究中成就最为突出的一个领域，涌现出一大批老、中、青学者。

在老一辈学者中，大矢透由于出版了《假名源流考及正本写真》（1911 年）、《周代古音考》（1914 年）等论著，在音韵学和日本汉字音研究领域的杰出成就，而于 1916 年荣获在日本学术界具有崇高地位的日本学士院恩赐奖。后藤朝太郎于 1938 年出版了《汉字音の系统》，仓石武四郎的博士论文是《段懋堂の音韵学》¹⁰，冈井慎吾曾著有《玉篇の研究》¹¹，服部四郎曾著有《中原音韵の研究》¹²。

满田新造乃近代日本汉学界从事汉语音韵学研究的代表性学者。早在 1915 年就出版了研究中国古代音韵史的专著——《支那音韵の历史的研究》（又名《支那音韵断》）。他的代表性论著都收在《中国音韵史论考》¹³一书中。值得注意的是，该书中所收的《评高本汉支那古音研究的根本思想——再论音韵研究的方法》一文，对当时流行的被誉为西方汉学研究丰碑的瑞典著名学者高本汉的音韵学研究进行了批评。他认为高本汉的研究存在以下一些问题：1、高本汉认为《切韵》音在中国各地通行，近代音都是从《切韵》派生而来。事实并非如此。2、高本汉认为《切韵》乃根据隋代一方言而成。实际上是参考了南北方语音和古代音而成的。3、虽说是研究古音，但所作的音表等，是根据宋以后的音图，所以高本汉的研究实际上只是近世音的研究。4、高本汉多根据推论来讨论音韵的变化，而所据的理论是印欧语系的法则，对于汉语本身的法则未能研究。5、高本汉的论述多作全称判断，难以接受。6、对高本汉所作的三、四等音的区别，有不同意见之处。7、对高本汉所定的音值，也有不少不同看法。¹⁴

大岛正健早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即从事《韵镜》的校订和研究。他著有《支

10 日本均社之会，1974 年。

11 日本东洋文库，1933 年。

12 与藤堂明保合著，日本江南书院，1958 年。

13 日本武藏野书院，1963 年。

14 参见李庆：《日本汉学史》第三部《转折和发展（1945-1971）》，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年，第 537 页。

那古韵史》¹⁵、《韵镜音韵考》¹⁶、《韵镜新解》¹⁷、《韵镜と唐韵广韵》¹⁸、《改订韵镜》¹⁹、《汉音吴音の研究》²⁰、《音韵漫录》²¹等书。《汉语吴音の研究》一书以日语中保留的吴音为基础,研究了中古汉语的发音问题。

河野六郎既研究汉语音韵学,也从事朝鲜语的语音、语法史及一般语言学的研究。他的论著几乎都收入《河野六郎著作集》²²,其中的第二卷为《中国音韵学论文集》,收有《玉篇反切の音韵研究》、《中国音韵学と朝鲜》、《慧琳众经音义の反切の特色》、《关于〈广韵〉这部韵书》、《汉字音及其传承》、《〈东国正韵〉と〈洪武正韵译训〉》、《再论〈东国正韵〉》、《关于日本吴音》、《朝鲜汉字音的一个特点》、《朝鲜汉字音と日本吴音》等。值得一提的是,上文提及的他的专著《朝鲜汉字音の研究》利用《训民正音》等十几种古代资料,分绪论、资料、总论、声类、韵类和结论六个部分,详细论述了朝鲜汉字音与中古汉语音韵之关系,对于进一步研究中古汉语音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该书代表了当时日本学者研究朝鲜汉字音问题的最高水平。

水谷真成主要从事汉语音韵史的研究,尤其是梵汉对音的研究。他精通梵语,并对西域各种语言有相当了解,所译注的《大唐西域记》质量甚高。他研究中古汉语音韵,经常联系梵文的资料,成绩卓著。《中国语史研究——中国学与印度学的接点》²³收入了水谷真成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发表的24篇重要论文,包括《唐代汉语鼻音声母的非鼻音化过程》、《晓、匣两声母的对音——大唐西域记夷语音释稿之三》、《表示梵语音的汉字中声调的功能》、《表示梵语“卷舌”元音的汉字——二等重韵和三四等重组》、《上古中古音韵史上的诸问题》、《慧琳音义杂考》、《慧琳の言语系谱》、《慧苑音义音韵考——资料的分析》、《关于声明》、《陆法言〈切韵〉》、《佛典音义书目》等。在上述论文中,他利用众多的梵汉、藏汉对音资料,对唐代语音进行了系统的共时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其中利用隋代智通至唐代慧琳的大量音译汉字论证唐代非鼻音化

15 日本富山房,1929年。

16 日本启成社,1912年。

17 日本松云堂,1926年。

18 日本松云堂,1926年。

19 日本启成社,1912年。

20 日本第一书房,1931年。

21 日本内外出版协会,1898年。

22 日本平凡社,1979—1980年。

23 日本三省堂,1994年。

过程,对《慧苑音义》音韵的周详考证,对慧琳作为北天竺系转写汉字对音系统的全面考察,通过《大唐西域记》夷语音释研究晓、匣两声母的对音,以《大唐西域记》为例从理论上系统总结音译汉字音注的有关问题,均堪称唐代语音研究的典范之作。此外,他还探讨了上古到中古之间音韵史上的若干问题,尤其是关于音译汉字研究及声调史研究的方法。

上田正的最大成就在于《切韵》研究。他的《切韵逸文の研究》²⁴从多达285种的文献资料中辑出各家《切韵》的逸文,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他的《切韵残卷诸本补正》²⁵根据缩微胶卷核对了敦煌切韵残卷,校正了《瀛涯敦煌韵辑》、《十韵汇编》之舛误,并补充了尚未发表的残卷10种。此外,上田正尚有《切韵传本论考》、《切韵诸本反切综览》、《论全本王仁煦切韵》、《陆法言切韵辑佚》、《关于苏联所存的切韵残卷》、《论新撰字镜的切韵部分》、《东宫切韵论考》、《玄应反切综览》、《玄应音义诸本论考》、《慧琳反切综览》、《慧琳音论考》、《关于慧琳音的韵部通用的统计研究》、《希麟反切综览》、《玉篇残卷论考》、《玉篇佚文论考》、《玉篇反切综览》、《有关唐代语音清浊的一份资料》、《论中古汉语的三等韵》等论著。

有坂秀世的《上代音韵考》²⁶一书中的“汉字音”(即“古代中国语的音韵组织”)部分,以高本汉的学说理论为主要参照,探讨汉字音与汉语中古音考订之间的关系。该书批评高本汉使用了二手汉字音资料,而且又是不完全可靠的汉字音资料。此外,有坂秀世认为,在高本汉《切韵》音语音构成的研究中,日本汉音和吴音担当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同时高本汉又将这种日本汉音和吴音作为推定日本古代音节、音值的根据,也让人怀疑是否陷入了循环论证之结局。有坂秀世的这个思考也是值得注意的。有鉴于此,有坂秀世在研究汉语中古音时,使用日本汉字音资料是十分谨慎的。²⁷

藤堂明保的研究领域包括汉语音韵学、词源学以及中国文学、思想诸方面。他著有《中国语音韵论》²⁸、《藤堂明保中国语学论集》²⁹、《汉字语源研究》³⁰、《汉字语源

24 日本汲古书院,1984年。

25 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附属东洋学文献中心刊行委员会,1973年。

26 日本三省堂,1955年。

27 参见李未:《日本学者对日本汉字音与汉语中古音关系的研究》,载《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28 日本江南书院,1957年。

29 日本汲古书院,1987年。

30 日本学灯社,1963年。

辞典》³¹等。此外，他还曾与服部四郎合著《中原音韵の研究》³²，与小林博合著《音注〈韵镜〉校本》³³。《中国语音韵论》堪称他在音韵学领域的代表之作。该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充分运用日本所特有的中古时期的写经、日本的汉字读音、假名注音等资料，并吸收了高本汉等人的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以重建中古汉语音韵体系。

小川环树主要从事汉语音韵学及中国文学的研究。其论文集《中国语学研究》³⁴收入了他的主要论文，包括《反切的起源及四声、五音》、《等韵图和韵海镜原——唐代音韵史的一个侧面》、《诗经异文的音韵特点》、《苏东坡古诗用韵考》等。

赖惟勤主要从事汉语音韵学的研究。他关于音韵学的论文大多收入《赖惟勤著作集》第1卷《中国音韵论集》³⁵，包括《关于上古汉语喉音韵尾》、《汉音之声明及其声调》、《中国音韵史上的争论点》、《关于清朝以前的协韵说》、《上古汉语舌音韵尾诸部的分部问题》、《段玉裁的异平同入说》、《关于段玉裁的古音第十二部》、《关于上古汉语韵母的两三个问题》、《关于上古韵母》、《台堆都音变考》、《关于〈切韵〉》、《中古汉语的喉音韵尾》、《关于内转、外转》、《关于中古汉语的内、外》、《日本的汉字音》和《作为汉语声调史资料的佛教音乐》等。其中最前面的两篇论文最有价值。《关于上古汉语喉音韵尾》作于1953年，曾对李方桂的上古音学说产生了很大影响。该文才曾被译成中文，以《赖惟勤“合口性喉音韵尾说”简介》为题刊布于《语苑撷英——庆祝唐作藩教授七十寿辰学术论文集》³⁶。《汉音之声明及其声调》作于1951年，是有史以来对晚唐汉语声调调值的第一次精密的考查，其结论十分可信。³⁷该文已被译成中文，发表于《南大语言学》第一编³⁸。

三根谷彻主要从事汉语音韵学和越南汉字音的研究，著有《越南汉字音の研究》³⁹、《中古汉字音と越南汉字音》⁴⁰等，其中后者荣获日本学士院恩赐奖，包括《韵镜と中

31 日本学灯社，1965年。

32 日本江南书院，1959年。

33 日本木耳社，1971年。

34 日本创文社，1977年。

35 日本汲古书院，1989年。

36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8年。

37 参见[日]水谷诚、梁晓虹：《赖惟勤先生传·赖惟勤先生论著目录》，载《南大语言学》第1编，商务印书馆，2004年。

38 商务印书馆，2004年。

39 日本东洋文库，1972年。

40 日本汲古书院，1993年。

古汉语》、《中古汉语的韵母的体系——一切韵的性质》、《韵镜と越南汉字音》、《关于唐代的标准语音》、《宋代等韵图の构成》、《中古汉语と越南汉字音》等论文。该书对于中古汉语音韵研究十分有用。

坂井健一主要从事汉语音韵学及汉语方言词汇的研究。他的专著《魏晋南北朝字音研究——经典释文所引音义考》⁴¹，以《经典释文》为中心研究了汉语中古音问题。其论文集《中国语学研究》⁴²，深入考察了《经典释文》、《广韵》、《韵略》及宋词押韵等，并研究了《切韵》前后的语音演变历史。

尾崎雄二郎主要从事汉语音韵史的研究，有专著《中国语音韵史の研究》⁴³以及论文《古音学中韵尾的设定与音韵特性的“预约”问题》、《以段玉裁〈六书音韵表〉观察诗经合韵》、《作为音量的汉语声母》、《汉语声母的音量所带来的东西》、《汉语喉音韵尾论献疑》、《关于切韵的规范性》、《关于切韵系韵书中韵的排列》等。

饭田利行主要从事汉语音韵学研究，继承其师大岛正健之业，构拟汉语古韵之体系。他在所著的《日本所存支那古韵研究》⁴⁴一书中指出，作为支那古韵研究资料，可举出周、秦、汉魏六朝时代的韵文，日本的假名音、梵语佛典音、朝鲜音等等。他认为假名是表音的，不管时间和场所如何，均保持着字音的永久性。该书主要根据日本所存的古书中的有关字音的记录、佛教典籍中有关的资料、汉籍中的古代典籍等三部分资料，又参考其它书籍 300 余种，对上古音进行了深入研究，具有重要价值。⁴⁵此外，他还著有《关于日本佛家传诵的音韵研究资料》等。

辻本春彦主要从事汉语音韵学研究，有专著《广韵切韵谱》（第三版）⁴⁶以及论文《洪武正韵反切用字考——关于反切上字》、《洪武正韵反切用字考——关于反切下字》、《论洪武正韵的入声》、《论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的反切》、《韵学集成与中原雅音》、《所谓三等重组的问题》、《论日本汉字音——汉音》等。

平山久雄主要从事汉语音韵史及现代汉语语音研究，成果甚丰。他在汉语音韵史

41 日本汲古书院，1975 年。

42 日本汲古书院，1995 年。

43 日本创文社，1980 年。

44 日本富山房，1941 年。

45 参见李庆：《日本汉学史》第三部《转折和发展（1945-1971）》，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年，第 779 页。

46 日本均社之会，1986 年。

领域的论文主要包括《唐代音韵史上轻唇化的问题》、《中古汉语の音韵》、《切韵蒸、职韵和元韵的音值》、《中原音韵入派三声的音韵史背景》、《重组问题在日本》、《日僧安然悉昙藏里关于唐代声调的记载》、《从历时观点论吴语变调和北京话轻声的关系》、《汉语声调起源窥探》、《敦煌毛诗音残卷反切的结构特点》、《隋唐音系里的唇化舌根音韵尾和硬腭音韵尾》、《中古汉语的清入声在北京话里的对应规律》等。他的论文有多篇发表于中国学术刊物，如上述后5篇论文分别发表在《中国语文》、《语言研究》、《古汉语研究》、《语言学论丛》和《北京大学学报》。《平山久雄语言学论文集》已于200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共计收录著者用中文撰写的代表性论文17篇，为广大中国读者了解平山久雄的学术成就提供了极大便利。

大岛正二主要从事汉语音韵学研究，除了上文提及的《唐代字音の研究》外，另有专著《中国言语学史》⁴⁷，以及论文《论上古汉语的一、二等韵》、《史记索隐·正义音韵考》、《颜师古汉书音义の研究》、《颜师古汉书音义韵类考》、《颜师古急就篇注音韵考》、《后汉书音义音韵考》、《晋书音义音韵考》、《论敦煌出土礼记音残卷》、《曹宪〈博雅音〉考》、《反映〈琵琶记〉用韵的元末吴方言》等。

庆谷寿信主要从事汉语音韵史的研究，有《敦煌出土の音韵资料》（上、中、下）、《〈俗务要名林〉反切声韵考》、《中国音韵学史上的一个问题——关于顾炎武的“二合音”》、《论附于〈玉篇〉卷末的〈五音声论〉》、《濮阳涑〈韵学大成〉と王文璧〈中州音韵〉》等论文。

望月真澄主要从事汉语音韵史的研究，有《论上古汉语的之部合口音》、《论上古汉语的收唇韵部》、《慧琳音韵中的反切特征》、《〈集韵〉中的吴语的侧面》、《〈中原音韵〉的音韵论》、《〈中原音韵〉的中“庄”等合口音》、《慧琳音韵中的反切特征》、《〈洪武正韵〉依据方言》、《日本吴音的音韵法则》等论文。

特别要提到的是，桥本万太郎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与一般日本学者有很大不同。他于1960年在东京大学修完博士课程，后赴美留学，1965年毕业于俄亥俄州立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曾在美、日大学任教。这样的学术经历，使他既具有日本传统汉学的深厚功底，又充分吸收了西方语言学界的研究方法，堪称集东西方学术思想于一身，在从事汉语研究时视野开阔，有许多独到见解，可惜英年早逝。他的主要论著均收入《桥本万太郎著作集》，其中第一卷是《言语类型地理论·文法》，第二卷是《方

47 日本汲古书院，1998年。

言》，第三卷是《音韵》。他能够摆脱 19 世纪欧洲语言学的成见，将语言看作是历史的和地理的结构连续体，从而将东亚大陆古今南北的语言融于一炉加以研究。他在《言语类型地理论》（中译本名为《语言地理类型学》，余志鸿译，北大，1985）一书中，就东亚大陆的语言变化阐述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认为存在“农耕民型”与“畜牧民型”两种不同类型的语言。在东亚大陆，“农耕民型”语言占优势，它们有不同于印欧语言的独特的发展道路。他从殷商帝王名称祖甲、帝盘庚到春秋时代齐太公子孙名称乙公、丁公的变化，从《诗经》中的“中谷”、“中林”一类词语，从地名“鸡公山”、“城濮”和安徽、湖北以南大部分地区的“鸡公”、“鸡婆”、“牛公”、“狗母”等说法，以及粤、闽、客家、吴诸方言中的“菜干”、“人客”、“尘灰”等古今材料推定，早期汉语乃中心语在前，修饰成分在后。

除了上述造诣很深的老一辈学者之外，日本年轻一代的音韵学家也已逐渐成长起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远藤光晓堪称其中的佼佼者，他的专业方向主要为汉语音韵学及方言学，对《切韵》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成绩卓著。此外，他的论文《〈中原音韵〉的成书过程》在佐佐木猛《能以〈中原乐府音韵类编〉勘正〈中原音韵〉的错误吗？》一文的基础上，进一步比较《中原音韵》与《中原乐府音韵类编》之内容及音韵体系，指出《中原音韵》乃是按《广韵》依次拾字编成的《中原乐府音韵类编》一书之增补改订本，而非周德清直接根据元曲的初期名家之实际作品归纳编撰而成的。他的另一篇论文《〈四声通解〉所据资料的编纂过程》，将朝鲜李朝崔世珍的《四声通解》（1517 年）与元明时代的中国韵书作了比较研究，从而发现了《四声通解》中所反映出来的一些稀见的音韵资料。还有，他的论文《王叔和〈脉诀〉波斯语译本中所反映的 14 世纪初的汉语语音》，利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所藏的刺失德丁《伊尔汗的中国科学宝藏》内所含的王叔和《脉诀》中的波斯文对音，整理出《脉诀》中所反映的无入声韵尾音系和有入声韵尾音系，为研究 14 世纪初官话音的实际状况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他还撰有《〈翻译老乞大、朴通事〉里的汉语声调》、《〈重刊老乞大谚解〉牙喉音字腭化条件——附巴黎所藏的朝鲜资料》等论文。他的论文集《中国音韵学论集》⁴⁸已经出版。

平田昌司也是一位成就卓著的中青年音韵学家，他在治学方面的一个重要特色是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探究汉语音韵学，如他的论文《〈皇极经世声音唱和图〉与〈切韵

48 日本白帝社，2001 年。

指掌图》⁴⁹研究了术数等神秘思想对等韵学的影响，颇有新意。他曾主持日本文部省1993—1995年度科学研究费资助的大型科研项目“中国の方言と地域文化”，先后出版了5个分册的研究成果报告书。该项目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经汉语方言置于整个地域文化背景中加以综合研究。平田昌司在其代表作之一《雪后天晴的风景——中国语言文化圈的“内”和“外”》中指出，中国的语言文化从书面语而言是从属于一个中心的统一的世界（雪被），但是从口语、方言而言则是由内（汉语）向外（非汉语）延续的多元的世界（雪被下的景物），同时还提出了中国东南地区是非汉语完成了汉化过程的区域，西南地区是非汉语和汉语混杂的区域的假说。此外，他还发表过《“审音”と象数——皖派音学史稿序说》、《略论唐以前的佛经对音》、《〈事林广记〉音谱类“辨字差殊”条试释》、《〈刊谬补缺切韵〉的内部结构与五家韵书》、《反切上字“匹”の一解释》等论文。

高田时雄的中古汉语研究与敦煌学相结合，他的《依据敦煌资料对中国语史的研究》⁵⁰乃研究中古汉语音韵、语法之力作，对罗常培的《唐五代西北方音》进行了重要的补正，是敦煌文书中的汉藏对音研究之最新成果。同时，他所编的《中国语史の资料と方法》⁵¹，收有平田昌司《谢灵运〈十四音训叙〉の系谱》、木田章义《顾野王〈玉篇〉及其周边》、高田时雄《可洪随函录と行随函音疏》等3篇中青年学者的论文。这些论文对有关文献的背景及其在音韵学史上的地位作了精到的考证，材料翔实，堪称高质量之论文。他还编有《明清时代の音韵学》⁵²，该书是他主办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中国音韵史研究班”之报告论文集。此外，他的《关于慧皎〈高僧传〉中所见的特殊语法》、《中国语史の研究と敦煌学》等论文，亦具有重要价值。

小仓肇主要从事中国中古音和日本吴音的研究，其主要论著包括《日语吴音研究》⁵³以及《上古汉语的音韵体系》、《法华经单字反切考》、《金光明最胜王经音义字音考》等。

此外，金田一春彦、金泽庄三郎、真武直、小仓肇、矢放昭文、城田俊、马渊和夫、松本丁俊、讚井唯允、水谷诚、藏中进、佐佐木猛、古屋昭弘、佐藤进、花登正

49 载日本《东方学报》（京都）第56册，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4年。

50 日本创文社，1988年。

51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4年。

52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01年。

53 日本新典社，1995年。

宏、森博达、吉池孝一、西田龙雄、橘纯信、矢放昭文、中村雅之、富平美波、工藤早惠、臼田真佐子、池田巧、木津祐子、山崎雅人、筱崎摄子、松尾良树、内野雄一郎、森川久次郎、辻本春彦、田川一巳、长田夏树、岩田礼、山口角鹰、立石广男、木下铁矢、冈本勋、柏谷嘉弘、佐藤昭、高松政雄、藤井茂利、樋口靖、齐藤茂、户崎哲彦等学者，也在音韵学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日本说文会所编的《中国语音韵研究文献目录》⁵⁴，收录了到 1957 年为止的汉语音韵学论著目录。该目录不仅仅罗列文献资料，还注意反映音韵学研究过程中的发展与论争，颇具价值。

日本的文字学研究历史悠久，成绩卓著。早在 1 个世纪前，作为日本甲骨文研究开山祖师的林泰辅就发表了《关于周代书籍的文字及其传来》、《周代の金石と经子史传の文字》⁵⁵、《关于清代河南省汤阴县发现的龟甲牛骨》等论文。在最后一篇论文中，他详细论述了甲骨史料在古文字研究中的重要价值。1914 年，林泰辅以《商代汉字的研究》获得博士学位。此后他又出版了《周公和他的时代》、《龟甲兽骨文字》等著作。可惜他的《龟甲兽骨文字表》至今尚未出版。

白川静在中国古文字研究领域成绩卓著，著有《说文新义》（15 卷）⁵⁶、《金文通释》（56 辑）⁵⁷、《甲骨文金文论丛》（10 卷）⁵⁸、《甲骨文の世界：古代殷王朝の构造》⁵⁹、《金文の世界：殷周社会史》⁶⁰以及《字统》、《字训》、《字贯》等书。其中《说文新义》甲骨史料、金文史料和其它有关出土资料，对《说文解字》进行了全新的考证和解说。自从甲骨文发现以来，孙诒让、于省吾中国古文字学家都试图用甲骨史料、金文史料与《说文解字》进行互证性研究，但白川静可以说是首位完整地做完这一工作的古文字学家。《金文通释》原为授课讲义，从 1962 年开始在《白鹤美术馆志》上陆续发表。该书体例精当、考释博洽，显示出作者广收慎取的态度。尤其是考释部分，

54 日本汲古书院，1987 年。

55 本文在论及日本学者的有关文字学论著时，凡遇到书名或篇名中的の、と等简单明了的日语假名时，根据原文照录；遇到较为难懂的日语时，则译成汉语。书名或篇名中的汉字，一律依照中国简化字书写。

56 日本神户市白鹤美术馆，1969—1976 年。

57 日本神户市白鹤美术馆，1962—1984 年。

58 日本朋友书店，1960 年。

59 日本平凡社，1972 年。

60 日本平凡社，1971 年。

该书将前人及近现代学者考释的主要论述几乎全部引用，近乎铭文汇释。该书除了铭文考释之外，尚有金文学史、金文学研究方法等内容以及各种十分有用的索引和图表，从而使该书既对金文研究进行全面的回顾与总结，又便于学者利用。《甲骨文金文论丛》是一部多达十卷的学术巨著，由单篇考证性论文组成。该书从很大程度上为《说文新义》的撰写打下了基础。⁶¹此外，他还编有《金文集》。

贝冢茂树与同仁一起于1951年在东京创办了“甲骨学会”，出版《甲骨学》杂志，对于推动日本的古文字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曾对京都大学所藏的甲骨片进行了全面而又系统的整理与研究，完成了《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所藏甲骨文字》⁶²一书。该书是收录日本所藏甲骨最多、代表当时日本甲骨学研究水平的一部名著。《殷末周初的东方经略考》则是其在金文研究方面的代表作。此外，他还与伊藤道治合著有《甲骨文字研究》和《甲骨文断代研究法的再检讨》。贝冢茂树早期发表的甲骨文、金文方面的论文，有很大一部分收录在他的论文集《中国古代史的发展》⁶³第一部之中。

岛邦男在古汉语文字学方面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殷墟卜辞综类》⁶⁴和《殷墟卜辞研究》⁶⁵这两部著作之中。前者将63种甲骨著录中的卜辞逐条按照内容编排，总结出164个甲骨文部首，然后根据卜辞年代，将甲骨单字与称谓3,397个依次纳入到这些部首中去。此前的工具书只能查阅单字，而该书既可以查阅单字，也可以查阅整条卜辞，甚便读者。中国学者姚孝遂等借鉴《殷墟卜辞综类》之经验，编纂了《殷墟甲骨刻辞类纂》⁶⁶和《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⁶⁷等书。姚孝遂在《殷墟甲骨刻辞类纂》一书的“序”中指出：“这部《类纂》只不过是在《综类》的基础上补充了一些新的资料，在文字形体的分类方面重新考虑其分合，增加了隶释与原篆相对照，仅此而已。体例上基本一仍其旧，只是个别地方稍作调整。”《殷墟卜辞研究》也是总结甲骨学研究成果的巨著之一，资料翔实，价值颇高，堪称力作。⁶⁸

61 参见朱顺龙、何立民：《中国古文字学基础》，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132-134页。

62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59-1961年。

63 日本弘文堂，1946年。

64 日本汲古书院，1967年。

65 日本弘前大学文理学部中国学研究会，1958年。

66 中华书局，1989年。

67 中华书局，1988年。

68 参见朱顺龙、何立民：《中国古文字学基础》，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134页。

高田忠周开始研究汉魏晋唐书法，进而研究文字学。《古籀篇》⁶⁹乃其多年研究心血之结晶，曾荣获在日本学术界具有崇高地位的日本学士院奖。此外，他还编有《朝阳字鉴》⁷⁰。该书经中国学者汪仁寿增改后，更名为《金石大字典》，由上海碧梧山庄于 1926 年石印。

冈井慎吾于 1916 年出版了《汉字的形音义》⁷¹。《玉篇の研究》⁷²乃其博士学位论文，分为前篇和后篇。前篇又分成两部分，分别论述《玉篇》和《倭玉篇》之源流。前篇对《玉篇》的作者和版本源流等问题作了精细的考证，书中列出了日本所存的各种本子（共 7 卷）以及刊行情况，并根据各种本子，对《玉篇》原貌进行了深入研究。同时，该书将原本《玉篇》与宋本《大广益会玉篇》进行对照，分析了宋本的改易情况。此外，该书还将宋本与元本、明本以及《倭玉篇》等进行了比较研究，列出了它们之间的差异。后篇辑录了各种典籍中所引用的《玉篇》佚文，约有 2 千条。作者根据上述佚文，对原本《玉篇》进行辑补，共收到 1,588 字，后来又追加了 203 字。这就是后篇中的“内篇”。另外，将 349 个可能是《玉篇》的字列在后面，作为后篇中的“外篇”。⁷³此外，他还著有《日本汉字学史》⁷⁴、《说文新附字考证合编》⁷⁵、《五经文字九经字样笺正》⁷⁶等。

日本学者对《玉篇》研究非常重视。除了冈井慎吾的研究成果之外，其它还有上田正的《玉篇残卷论考》、《玉篇逸文论考》、《玉篇反切总览》，西宫一民的《令集解と玉篇》，森鹿三的《令集解所引玉篇考》，井上顺理的《〈令集解〉引〈玉篇〉佚文考——〈孟子传来考〉附论》，西端幸雄的《原本玉篇の出典配列形式》、《玉篇零卷出典索引》、《原本玉篇零卷玉篇佚文补正汉字索引》，高田时雄的《玉篇の敦煌本》、《玉篇の敦煌本・补遗》，长泽规矩也的《原本玉篇古写本断简の行方》，贞荻伊德的《关于玉篇和篆隶万象名义》，木田章义的《〈玉篇〉及其周边》、太田斋的《玄应音义对玉篇的

69 日本东京古籀篇刊行会，1925 年。

70 日本石印本，1925 年。

71 日本六合馆，1916 年。

72 日本东洋文库，1933 年。

73 参见李庆：《日本汉学史》第二部《成熟和迷途（1919-1945）》，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年，第 526-533 页。

74 日本明治书院，1934 年。

75 日本六合馆，1916 年。

76 商务印书馆，1926 年。

利用》、井野口孝的《关于智光〈净名玄论略述〉所引的〈玉篇〉》等。

杉本つとむ编有《异体字研究资料集成》⁷⁷，详见下文。同时，他还著有《汉字入门——〈干禄字书〉及对它的考察》⁷⁸等书以及《〈干禄字书〉觉书——关于汉字音的若干考察》等论文。此外，松尾良树撰有《〈干禄字书〉浅说》一文。

福田襄之介主要从事文字学等领域的研究。他的博士论文是《中国字书史の研究》⁷⁹。此外，他还发表过《尔雅の性格》、《关于说文解字中的籀文》、《说文解字说解の诸本》、《说文解字注释本の研究》、《说文解字说解の形式》、《说文解字与周易的关系》、《论字书》、《关于六书》、《关于扬雄方言的成立》等论文。

松丸道雄主要从事甲骨金文学、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考古学的研究。他与高岛谦一合编的《甲骨文字字释综览》⁸⁰，系统收集了1988年之前世界各地的471位学者的1,904种论著中的甲骨文字释，总次数多达25,000项。该书根据《甲骨文编》⁸¹体例分类编排，各字则按字释发表年代编排，既可综览某字字释，又可回顾该字研究历史。此外，该书同时拥有甲骨文字形和楷书字形两种检索表。该书的出版，为研究甲骨文提供了极大便利。此外，他还编著有《甲骨文字》、《日本所见甲骨文搜汇》、《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甲骨文字图版篇》、《新编金石学录》等。

藤堂明保在文字学领域亦颇有成就。他著有《汉字の起源》⁸²、《汉字の思想》⁸³、《汉字と文化》⁸⁴、《“武”の汉字と“文”の汉字》⁸⁵、《汉字及其文化圈》⁸⁶等。

阿辻哲次在文字学研究尤其是普及文字学知识方面成绩卓著。他著有《汉字学——〈说文解字〉の世界》⁸⁷、《汉字の字源》⁸⁸、《汉字の文化史》⁸⁹、《汉字史图说》⁹⁰等。

77 日本雄山阁，1983年。

78 日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72年。

79 日本明治书院，1979年。

80 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东京大学出版会，1994年。

81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华书局，1965年。

82 日本德间书店，1966年。

83 日本德间书店，1968年。

84 日本德间书店，1967年。

85 日本光生馆，1971年。

86 日本德间书店，1977年。

87 日本东海大学出版会，1985年。

88 日本讲谈社，1994年。

89 日本广播出版协会，1994年。

赤塚忠系著名汉学家。《赤塚忠著作集》的第 7 卷是《甲骨金文研究》。他在文字学领域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对甲骨文和金文的解读。

中青年学者笹原宏之在日本国字以及汉字与中日文化交流研究领域取得了很大成绩。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是《国字の位相と展开》。此外，他还发表过《国字と位相——江戸时代以降の例に見る“个人文字”の、“位相文字”、“狭义の国字”への展开》、《国字の发生》、《现代日本の异体字——汉字环境学序说》等论文。

此外，大庭修、池田温、藤枝晃、水上静夫、伊藤道治、木村秀海、江村治树、林巳奈夫、田中有、片山智士、宫崎市定、山田俊雄、小川三千雄、内野雄一郎、松尾良树、加藤常贤、中岛壤治、佐藤喜代治、三原研田、立石节子、北村信男、松本信广、土屋节子、目加田诚、伊东伦厚、森安太郎、一色英树、柳本实、进藤英幸、铁井庆纪、西川宁、松尾善弘、久岛茂、根岸政子、高桥由利子、中前千里等学者，也在文字学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

第二，由于日语在词汇、音韵、文字诸方面都深受汉语的影响，因此通过比较等手段研究汉语和日语的历史和现状，有助于解决训诂学研究中的某些疑难问题。日语中的汉语词汇大多源自汉语，有些尚保留着中古近代汉语的词义及词形，但因为年代久远，有不少词汇之源流以及确切含义却往往不为人所察。如“退婴”一词，《辞源》、《辞海》、《现代汉语词典》、《中文大辞典》等均未收录，《汉语大词典》收有该词，释义如下：语出《老子》：“专气致柔，能婴儿乎？”王弼注：“专，任也。致，极也。言任自然之气，致至柔之和，能若婴儿之无所欲乎？”婴，一本作“纓”。后以“退婴”谓像婴儿一样柔弱无争。含贬义。鲁迅《集外集拾遗·〈新俄画选〉小引》：“排外则易倾于慕古，慕古必不免于退婴，所以后来，艺术遂见衰落。”聂绀弩《鲁迅——思想革命与民族革命的倡导者》：“别的革命者的思想，往往局限于一定的时期，一定的境界，时过境迁，就褪色，退婴，乃至消失。”⁹¹岑麒祥《汉语外来词词典》则认为“退婴”一词源出日语，系“退缩、保守”之义。“退婴”在日语中属常用词，任何一种日本国语辞典或日汉词典均予收列。小学馆《日本国语大辞典》将“退婴”释为“倒退，闭居不出，毫无积极进取之心”。藤堂明保《学研汉和大字典》专门对“婴”字作了解释：围绕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不出其外。《新明解国语辞典》注明“婴”之义为“守”。据

90 日本大修馆书店，1989 年。

91 参见《汉语大词典》第 10 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2 年，第 845 页。

此,“退婴”之“婴”并非指“婴儿”,而应该是动词,意为“环绕”或“保守”。但实际上“退婴”并非日人据汉语之义创造的和制汉语,而是至迟出现于宋代的汉语词汇。范浚《香溪集·徐忠壮传》云:“徽言拥帐下士,决命战门中,几百遇,所格杀甚众,左右死伤亦略尽。退婴牙城以守,敌攻不已,众蚁登。”⁹²此乃“退婴”之词源所在。“退婴”之“婴”实为“婴城”之略,乃“以城自绕”之谓。又由于“婴城”之意在乎“守”,故“退婴”之“婴”之“婴”尚可理解为“婴守”。⁹³

从音韵学角度来考察,日语汉字音读与中古近代汉语音韵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在日本及中国学者所发表的大量音韵学论著中,有许多内容涉及日语汉字音读与中古近代汉语音韵的比较研究,如城田俊的《中古汉语音韵论》⁹⁴、高松政雄的《日本汉字音概论》⁹⁵和《日本汉字音论究》⁹⁶、筑岛裕所编的《日本汉字音史论辑》⁹⁷、沼本克明的《日本汉字音の历史的研究》⁹⁸、真武直的《日华汉语音韵论考》⁹⁹、冈本勋的《日本汉字音的比较音韵史的研究》¹⁰⁰、张升余的《日本唐音与明清官话研究》¹⁰¹、丁锋的《琉汉对音与明代官话音研究》¹⁰²、李无未的《日本学者对日本汉字音与汉语上古音关系的研究》¹⁰³、《日本学者对日本汉字音与汉语中古音关系的研究》¹⁰⁴等。此外,朝鲜汉字音、越南汉字音与中古近代汉语音韵以及日本汉字音的关系同样非常密切,日本和中国学者在这方面也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如上文提及的河野六郎的《朝鲜汉字音の研究》、三根谷彻的《越南汉字音の研究》和《中古汉字音と越南汉字音》,以及小仓进平的《增订朝鲜语学史》¹⁰⁵、崔羲秀的《朝鲜汉字音研究》¹⁰⁶、成元庆的《韩国

92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1986年,第171页。

93 参见何华珍《日本汉字和汉字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23—229页。

94 日本风间书房,1981年。

95 日本风间书房,1986年。

96 日本风间书房,1997年。

97 日本汲古书院,1995年。

98 日本汲古书院,1997年。

99 日本樱枫社,1969年。

100 日本樱枫社,1991年。

101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

10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103 载《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104 载《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105 日本刀江书院,1963年。

106 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86年。

字音与中国声韵之关系》¹⁰⁷等。

日汉对音资料是用汉字及其所具有的发音对应性地记录日语,包括句子、短语、单词、汉字和假名发音的历史语料。日汉对音资料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汉语与日本本岛语言相关的,一类是汉语与日本琉球群岛语言相关的。就语言谱系而言,二者都是汉语(包括汉语各方言)与日语(包括日语各方言)相对应的材料。日汉对音文献现存20多种,系中日学者研究汉语音韵史和古代日语的宝贵资料。¹⁰⁸

将日语汉字读音与汉语读音进行比较研究,对于研究古汉语音韵及其发展变化具有重要价值。由于日语汉字音读中的语音来自中国历史上不同的地区或时期,故又可分为吴音、汉音、唐宋音(又称唐音或宋音)、现代音四种。吴音是日语汉字音读中所占比例较高的读音之一。日本政府于1981年10月公布的新的《常用汉字表》收录汉字1945个,共有音读2187种,其中吴音占37.8%。吴音是从中国南北朝时期的江南地区通过朝鲜半岛传至日本的。《切韵》虽成书于601年的隋代,但它是对公元400—600年前后的中古汉语音韵的前期音的总结,其中吴音占相当大的比重,故6世纪之前传到日本的吴音的许多音韵规律可以从《切韵》中找出。吴音在日本主要用于佛教诵经,所以现代日语中的佛教用语大多为吴音,如杀生(せつしよう)、经文(きようもん)、修行(しゅぎよう)、六根清净(ろっこんしようじよう)等。此外,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及食物名也有吴音读音。隋唐乃古代中日两国交流的鼎盛时期,人员往来频繁,当时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中原音传到了日本,对日语汉字音读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而有了汉音。由于日本朝廷的大力提倡,汉音得以较为迅速地推广。到了后来,汉音和吴音有了较为明确的使用范围和界限。798年的日本官方文书云:“用汉音,读五经,明经之徒从之读十三经也。如诗文杂书,吴汉杂用。佛书仍旧以吴音读焉。”(筑岛裕:《国语的历史》)成书于1008年的《广韵》既参考了《切韵》,又收录了隋唐时期的中原音韵,故许多汉音均可从《广韵》中找出其对应关系。在《常用汉字表》中的2187种音读中,汉音占54.7%,如街道(かいどう)、风情(ふせい)、人数(にんず)、疾病(しつぺい)、富贵(ふうき)等。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就是将日本音读与《切韵》对照一下,就会发现吴音在声母方面与《切韵》基本一致,而在韵母方面的差异甚大。

107 中国文学出版社,1994年。

108 参见丁锋:《日汉对音汉语音韵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载《汉语史学报》第5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

与之相反,汉音在韵母方面与《切韵》大体相同,而在声母方面则差距明显。这一现象,对于我们研究中古汉语音韵的发展变迁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唐宋音(注:此处的“唐”乃指中国,而非唐朝)主要源于宋、元、明、清时期的中原地区。由于汉音和吴音在日语音读中的地位已很稳固,加上这一时期中日交流不如隋唐时期众多,故唐宋音数量很少,在《常用汉字表》中仅有16例,占0.7%。唐宋音主要出现在禅宗语言和一些宋元明清时代出现的日常生活用语上,如和尚(おしょう)、扇子(せんす)、行宫(あんぐう)、南京(なんきん)、扬子江(ようすこう)等。由于唐宋音出现的年代不同,故其读音也不尽一致,如“提灯”一词是宋代传至日本的,念成“ちようちん”;而“行灯”一词则是明清时期传过去的,所以读为“あんでん”。不过这样的音为数不多。现代音则是近百年来从中国传到日本去的词汇的读音,其中有不少中国各地的方言。¹⁰⁹

值得重视的是,沼本克明在其力作《日本汉字音の历史的研究》¹¹⁰中,通过系统分析并归纳各个时代的汉字音资料,首次提出与日语“汉音”相一致的音系是《慧琳音义》,而不是一般所认为的《切韵》。日本汉语史学界对沼本克明的这一重要研究成果评价甚高。此外,他依据平安时代经典古抄本上用假名所注的汉字音编制的《吴音·汉音分韵表》,乃研究汉语音韵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从文字学角度而言,由于中日两国所使用的汉字大致相同,故可比性更强。汉字传入日本后,被日语借用,有扬有弃,一直使用到今天。日语中的汉字与汉语中的汉字相比,也有一些不同之处,如日语汉字中的简化字、俗字及日本国字。

日本的简化字有些与中国相同,有些有点不同甚至差异很大。有许多简化字粗粗一看以为是日人创建的,中日两国出版的一些权威性辞书也是这么认为的。其实不然,大多数日本简化字都可以在中国历代文献中找到出处。在日本到处可见的“桜”字,《中华字海》曰:“桜:同‘樱’,字见日本《常用汉字表》。”¹¹¹其实,唐碑中“嬰”之草书楷化作“𦵏”¹¹²,明代文徵明书法中“樱”则为“桜”¹¹³。又如“様”,日本常用汉字作“様”,中国现行汉字为“样”。《成化丁亥重刊改并五音类聚四声篇海·木部》:“様,

109 参见成春有:《日语汉字音读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2年。

110 日本汲古书院,1997年。

111 冷玉龙等:《中华字海》,中华书局、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4年,第751页。

112 《书法字典》,上海书店,1985年,第116页。

113 《书法字典》,上海书店,1985年,第272页。

辞两切，栝实也。”¹¹⁴又《手部》：“暗，余尚切，式暗也。”¹¹⁵《重订直音篇·木部》：“様，同上（橡）。”¹¹⁶《同文通考》认为“様”系倭俗讹字，¹¹⁷也是不正确的。¹¹⁸

丁锋曾就所见中国古代字体方面的著述作过一个不完整的统计，指出：“日本《常用汉字表》中出现的特殊汉字有390多个既已出现于中国历代文献或属于其类推情形，占总数的近九成。说明日语中的特殊汉字绝大多数是继承中国原有形体的，而且多是有文献可证，有时代可循的。从此可以体味到日本在检讨汉字，选择形体的操作中，是非常尊重汉字的史实和非常重视汉字的传承的。”¹¹⁹

笔者认为，有些日本简化字虽可从中国文献中找到出处，但日方简化时未必见到或参考了中方文献，其中有巧合的情况。当然，笔者的这一看法建立在推断的基础上，尚未找到足够的证据。

国字是日人根据汉字构形原理而创造的汉字，仅在日本一国使用，又称为倭字、和字、和俗字、和制汉字、新字、皇朝造字、本邦制作字等。国字的造字法以会意居多，大体上可以分为下列5种情况：1、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汉字素组合而成。汉字素有意义的最小汉字单位，中国的汉字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汉字素构成的。受这种构字法的影响，日本国字中的很大一部分是用这种方法构成的，如“畑（はた）”、“峠（とうげ）”、“辻（つじ）”等。2、省略或简化汉字素。省略汉字素造字法是在中国原有汉字的基础上，省略一个汉字素，然后再对笔画略作更动而构成的一个新字。如“匂（におう）”和“川（くん）”，是在汉字韵和训的基础上省略了音和言，再略作变化而成的。再者，汉字韵的异体字有匀、均、韵等，训的异体字有川、训、驯等，因而上述国字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中国汉字异体字的影响。另有简化汉字素造字法。如“凧（たこ）”就是将风简化为几，再与巾组合而成的，意思是风筝。

114（金）韩孝彦、韩道昭撰，（明）释文儒、思远文通删补：《成化丁亥重刊改并五音类聚四声篇海》，《续修四库全书》第22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2年，第384页。

115（金）韩孝彦、韩道昭撰，（明）释文儒、思远文通删补：《成化丁亥重刊改并五音类聚四声篇海》，《续修四库全书》第22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2年，第445页。

116（明）章黻：《重订直音篇》，《续修四库全书》第23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2年，第144页。

117 [日]新井白石：《同文通考》，《异体字研究资料集成》第1卷，日本雄山阁，1983年，第293页。

118 参见何华珍：《日本汉字和汉字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58-160页。

119 丁锋：《日本常用汉字特殊字形来源小考》，“新世纪汉语史发展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杭州，2003年12月。

“凧(こがらし)”、“凧(なぎ)”等也属于这种情况。3、变换一个汉字素。如“桮(ふもと)”是由汉字麓变化而来的。麓与桮均表示山脚下的意思,其共同之处是上部的汉字素都是林。汉字麓乃形声字,其汉字素是表音的。而桮则是会意字,其汉字素是起表意的。4、增加一个汉字素。如“築(やな)”是在汉字梁之上加了一个汉字素竹。梁的一个意思是表示桥。“築”是指捕鱼的一种工具,就是在河中用木、竹等拦成一道篱笆,然后留出一个口子,让鱼只能从这个口子通过,在这个口子处可以用网捕鱼。“築”就是指这种用木或竹排成的篱笆,由于这种装置是用竹子做的,而且又像桥一样横跨在河上,所以就用竹和梁组成了这个会意字。5、根据书体变化造字。日本人从书体演变的过程中得到启示,创造了部分国字。如《古事记》中出现的国字“俣(また)”,就是从汉字俣派生出来的。此类国字原先都有汉字楷书的原形,后来在草书体书写的过程中变形了,最后又由草书楷化成一个新字形,并被保留了下来。¹²⁰国字在增减、变换、拼合汉字构字部件等方面,往往较中国汉字造字法更独具匠心。如“畑”的造字法即为会意,意思是旱田,以区别于水田。

菅原义三的《国字の字典》¹²¹收有国字 1,551 个,但日本出版的权威性语文辞书所收之国字均未超过 200,如《大汉和辞典》¹²²收有 141 字,《汉字百科大辞典》¹²³中的“国字一览”共计 170 字。历史上的《倭字考》、《国字考》、《异体字辨》和《同文通考》,分别收有国字 168、119、89、81 个。常用的国字就更少了,《常用汉字表》中仅有 8 个,占常用汉字的 0.41%。在一些汉语辞书和日汉词典中,由于不了解国字的确切含义,常有误释。如《常用汉字表》中的“峠”字,《中华字海》云:“峠,同‘卡’。”¹²⁴这一释义与“峠”字在日语中的含义相距甚远。《汉语大词典》:“卡,旧时在交通要道或险隘路口设兵守卫或设站收税的处所。”¹²⁵“卡”字是一个后起方言字,早见于《字汇补·卜部》:“楚属关隘地方设兵立塘谓之守卡。”¹²⁶《中华字海》盖拆“峠”字而释,以为“峠”字由“上山下山”构成,路隘道险,正可设“卡”。事实上,目前所见汉语

120 参见李月松:《现代日语中的汉字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92-94页。

121 日本东京堂,1992年。

122 日本大修馆书店,1995年。

123 日本明治书院,1996年。

124 冷玉龙等:《中华字海》,中华书局、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4年,第442页。

125 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第1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第987页。

126 (清)吴任臣:《字汇补》,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年,第20页。

辞书及文献未有“峠”字。《和尔雅·杂类·倭俗制字》：“峠，宜用岭字。”《同文通考·国字》：“峠，トウゲ，岭也。岭，高山之可逾而过者也。”¹²⁷《倭字考·山部》：“峠，岭。岭，是山上，既上则宜下，故从山从上下，皇国会意之字。”¹²⁸《国字考·天地部》引《万叶集》、《下学集》论，“峠”是指上山下山分道的山岭，过往行人在此合手或折草向“道祖神”礼拜，以祈求旅途平安。¹²⁹王庆民曾指出：“比如‘峠’，常被理解为‘山顶、山颠’，1959年初版的《日汉辞典》里也是这样解释的。其实这是不确切的。《新日汉辞典》则纠正了这一误解，解释为‘（山路的）最高处’。在日本人的意识中，没有山路相通的山顶是不能称为‘峠’的。”¹³⁰可见，“卡”与“峠”的中日文化内涵相距甚远。¹³¹

“杵”也是国字，读音为 waku，本意是用细长的竹木制成的可张贴纸张、布帛等的框架，今多用于指限制、范围。中国汉字中有“杵”字，读音为 zuo（阳平），意思是柱子一端的榫头。“杵”、“杵”属于同一字之异体，但中日字义完全不同，“杵”也无来自汉语的音读，可看作偶然与中国固有汉字同体的日本国字，造字遣义时也许参考过中国字书，也许没有。“杵”的造字方法是将汉字固有部件机械合成，不属会意，可称作字素合成法造字。¹³²

俗字是相对于正字而言的。中国有俗字，日本也有俗字。日本俗字大体上可分为借用俗字、误用俗字、讹俗字三大类。《同文通考》：“本朝俗书，务要简便，凡字画多者，或有借方音相近而字画极少者以为用，其义盖取假借而已，世儒概以为讹，亦非通论，今定以为借用。”¹³³“弁”、“若”、“厂”、“表”等均为日本俗字。弁、辨音相近，借作辨、辩等字。若、弱音同，借作老弱之弱字。厂、雁，方音相近，借作雁字。表、俵方音相近，借作俵、裱等字。

《同文通考》云：“本朝俗书，凡字形近似，谬写作他字者，录于此，以为误用。”

127 [日]新井白石：《同文通考》，《异体字研究资料集成》第1卷，日本雄山阁，1983年，第258页。

128 [日]冈本保孝：《倭字考》，《异体字研究资料集成》第9卷，日本雄山阁，1983年，第171页。

129 [日]伴直方：《国字考》，《异体字研究资料集成》第9卷，日本雄山阁，1983年，第69—70页。

130 参见王庆民：《关于日本“国字”》，载《日语学习》1981年第1期。

131 参见何华珍：《日本汉字和汉字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7页。

132 参见丁锋：《日本常用汉字特殊字形来源小考》，“新世纪汉语史发展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杭州，2003年12月。

133 [日]新井白石：《同文通考》，《异体字研究资料集成》第1卷，日本雄山阁，1983年，第275页。

¹³⁴所谓“误用”，实际上也是异字同形，即字形相同而音义全异者。误用俗字的形成，除极少数属于另造新字外，大多与字形简化、繁化或讹变有关。如“𠂔”、“关”、“发”、“复”、“壬”、“𠂔”、“𠂔”、“𠂔”分别为“假”、“癸”、“友”、“夏”、“闰”、“圖”、“蜀”、“養”之误用俗字。又据《同文通考》：“本朝俗书，讹字极多，不胜尽载。今录一二，注本字于下以发例，华俗所用，亦不赘焉。”¹³⁵如“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分别系“休”、“弘”、“才”、“灵”、“氏”、“刈”、“梅”、“凶”之讹俗字。

136

第三，《篆隶万象名义》、《新撰字镜》、《倭名类聚抄》、《类聚名义抄》、《伊吕波字类钞》、《倭玉篇》、《和尔雅》等日本古辞书，《大汉和辞典》、《汉字语源辞典》、《广汉和辞典》、《〈学研〉汉和大字典》、《详解汉和大字典》、《日本国语大辞典》、《广辞苑》、《大字典》、《大辞典》、《字源》、《新字源》、《角川大字典》、《国字の字典》、《难字解字典》等日本近现代辞书，以及《古辞书音义集成》、《古辞书研究资料丛刊》、《异体字研究资料集成》、《今昔文字镜》等，对于汉语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篆隶万象名义》系日本弘法大师空海根据顾野王《玉篇》而编撰的，乃日本历史上最早的字典，是研究文字、音韵、训诂学的珍贵资料。今本《大广益会玉篇》与日本所藏唐写本原本《玉篇》残卷（仅存原书的1/8左右）已相距甚远，而《篆隶万象名义》所撰之书分部列字的情况与《玉篇》残卷相合，所收16900多字也同顾野王《玉篇》相当，注文中训释文字的义项也基本相同，只是删去了原书所引经传及顾野王按语。此外在部分正文之上增加了篆书。编排体例与《玉篇》一致，均分为30卷，依542部编次，始一而终亥。《篆隶万象名义》作为日人所撰的汉语中古字书，堪称原本《玉篇》之浓缩，为后人窥见顾野王《玉篇》之原貌提供了重要依据和参考。¹³⁷《篆隶万象名义》注释文字保留了原本《玉篇》的基本面貌，其反切记录了南北朝时期的语音状况，在音韵学上很有价值。其义训比《大广益会玉篇》丰富得多，在训诂学上亦颇有意义。诚如杨守敬所云：“若据此书校刻饬世，非唯出《广益玉篇》上，直当一部顾氏原本《玉篇》可矣。唯钞此书者草率之极，夺误满纸，此则不能不有待深于小

134 [日]新井白石：《同文通考》，《异体字研究资料集成》第1卷，日本雄山阁，1983年，第278页。

135 [日]新井白石：《同文通考》，《异体字研究资料集成》第1卷，日本雄山阁，1983年，第287页。

136 参见何华珍：《日本汉字和汉字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80-190页。

137 参见丁锋：《原本玉篇残卷的版本源流及其与〈篆隶万象名义〉的传承关系》，日本《熊本学园大学文学·言语学论集》第8卷第1号（2000年6月）。

学者理董焉。”¹³⁸《篆隶万象名义》和《原本玉篇残卷》¹³⁹均系日藏唐代传写本，字形大同小异，其中有大量相同的俗体、讹字，有助于考究写卷文字。在这一方面，《篆隶万象名义》与《龙龕手鏡》颇有相似之处。其中又有些文字同上古先秦文字密切相关相承，于隶古定字亦有助益。再则，该书对于研究汉字流变具有重要价值。《篆隶万象名义》只有日本山城国高山寺所藏鸟羽永久二年（1114）之传写本，日本崇文院于1927年据以影印，收入《崇文丛书》第一辑。中华书局于1995年依据《崇文丛书》本缩印出版后，《篆隶万象名义》已经逐步引起中国国内学者的重视，但无论是对该书的研究还是利用，都还远远不够。

《新撰字鏡》的编撰年代推定为平安朝初期，即昌泰年间（898—901）。编撰者昌住乃南部学僧。现存本是1124年十二卷抄本，宫内厅书陵部藏有完本。该书自“天部”至“连部”共计160部，凡20,940余字。该书分部不按《说文》、《玉篇》之顺序，而是依部首编排，同一部首内再根据“天象”、“人事”、“自然动植物”等分类，其中一部分又以四声排列，导致体例不够统一。该书之注解收集义训甚夥，其义训大多来自玄应《一切经音义》、《玉篇》和《切韵》，同时还旁采诸字书以增益之，此外尚有少量日本义训。“今为勘之，其正、俗等字有出于《集韵》、《龙龕手鑑》之外者。所列古文，亦有出于《说文》、《玉篇》之外者。盖昌住当日本右文之时，多见古小学书，（观《见在书目》可证）不第《玉篇》、《切韵》皆顾、陆原本也。”¹⁴⁰《新撰字鏡》以及释源顺的《倭名类聚抄》（约成书于931—938年）、具平亲王的《弘决外典钞》（成书于991年）、释信瑞的《净土三部经音义》（成书于1235年）等，均采用了《玉篇》的释义，对研究《玉篇》颇有价值。

具平亲王编撰的《弘决外典钞》除了采用《玉篇》的释义外，还引用了《周书异记》、《汉法本内传》、顾恺之《启蒙记通玄》、贾大隐《老子疏》、周弘正《庄子疏》、刘炫《孝经述议》等罕见中国古籍的资料，值得重视。释信瑞的《净土三部经音义》中的“三部经”是指《无量寿观经》、《观无量寿经》和《阿弥陀经》，该书所引的《东宫切韵》（早已亡佚）载有曹宪、陆法言、孙愐、王仁煦、麻果、薛峒、郭知玄、祝尚丘、孙柚、韩知十、武玄之、裴务齐、沙门清彻等之说，弥足珍贵。

138 《日本访书志》卷四，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

139 中华书局，1985年。

140 《日本访书志》卷四，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

影响甚大的《倭名类聚抄》(又名《和名类聚抄》,简称《倭名抄》或《顺倭名》)系汉学家释源顺在承平年间(931—938)编成。该书以汉字立条目,采用天、地、水、岁、时等部首分类,同一个“部”内又分“门”,所以称作“类聚”。书中的每个词条除了注音、释义以外,还附有出处。该书的一个重要特色是收入了为数不少的俗语词、口语词。

《类聚名义抄》乃成书于11、12世纪的汉日词典,系法相宗学僧所撰。书名中的“类聚”和“名义”系参照《倭名类聚抄》和《篆隶万象名义》,部首分类则基本上根据《玉篇》。该书收录汉字的正体和俗体,并将和训注于其下。各部之下,名义可以相附者,即汇入其中,在这方面有点像类书。《类聚名义抄》“虽稍涉庞杂,然古文奇字赖以考见者正复不少,固不得以《说文》等书律之也”¹⁴¹。名古屋女子大学原教授草川升所编的《五本对照类聚名义抄和训集成》,已由日本汲古书院出版。全书共分4卷,收录图书寮本、观智院本、莲成院本(镇国守国神社藏本)、高山寺本、西念寺本等5种版本的《类聚名义抄》中的和训,共计63,661条。该书对于中古汉语音韵及词汇等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倭玉篇》系《倭译大广益会玉篇》之简称,研究者对其成书年代有不同看法,大多依据现存最古本推定为延德三年(1491),也就是室町时代初期。《倭玉篇》在当时的日汉词典中具有代表性。其词条根据《玉篇》的部首排列。由于版本不同,最多的分为542部,最少的仅有100部。词条注释采用“训读法”,收入了大量流行语,从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此前词典中“训读”不足部分。北恭昭所编的《倭玉篇五本和训集成》,已由日本汲古书院出版。该书共计3册,其中《本文篇》1册,收录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室町中期写本《拾篇目集》、大东急纪念文库藏享禄五年(1532)写本《玉篇略》、米泽市立图书馆藏室町后期写本《倭玉篇》、大东急纪念文库藏弘治二年(1556)写本《倭玉篇》、大东急纪念文库藏大永四年(1524)写本《玉篇要略集》等5种不同版本的《倭玉篇》,另有《索引篇》分上、下两册,乃详细的和训索引,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便利。

日本近现代文献学泰斗长泽规矩也所编的《明清俗语辞书集成》¹⁴²,系从日本公私度藏的中国古籍中精选有关书籍二十种汇编而成,是研究近代汉语的重要参考书。

141 《日本访书志》卷四,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

142 日本汲古书院,1974年。

《集成》所收的各种刻本中，有稀见的善本，即使属晚清刻本，亦大多是流传不广的私家刻本或仿刻本，明清以降的版本目录书中也罕见著录。为了使国内有关学者有机会利用这部极有价值的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于 1989 年影印出版了该书。在影印之前，对其中佚名的明刊本《目前集》，觅得了上海图书馆所藏的明赵南星撰《味槩斋遗书》，此书系清光绪中高邑赵氏刊本，其中《目前集》的卷目及版本与日本影印本完全一致，盖光绪时用明旧雕版重印，上海古籍版乃据以补齐《题词》和残页，对版面不清者亦大多予以更换。同时，又据《中国丛书综录》多处著录及《味槩斋遗书》，确认《目前集》作者系明人赵南星。再则，《通俗常言疏证》亦以较清晰的同一版本对各卷文字模糊者抽换 60 余页。它如《里语证实》、《直语补正》等书的个别地方，也参照同类藏本作了修补。此外，为了便于查检，书后增附了四角号码索引。笔者认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日本汲古书院版《明清俗语辞书集成》这一事例，充分体现了中日两国的训诂学研究资料通过交流，可以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从而相得益彰、同受沾溉，其促进双方训诂学研究的繁荣与发展之功为两国学人所共庆。

在江户时代，日本的“唐话学”（“唐话”即当时的汉语）发展很快，学习及研究汉语的人甚多，出现了一大批汉语辞书及读本、课本。这些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的俗语、方言等情况，乃研究近代汉语的重要资料。日本古典研究会编、长泽规矩也解题的《唐话辞书类集》¹⁴³，集中收录了这类书籍，其中包括不少写本及稀见本。《唐话辞书类集》分为 20 集，收录《唐话类纂》、《胡言汉语》、《怯里马赤》、《语录译义》、《唐话为文笺》、《忠义水浒传解》、《忠义水浒传抄译》、《忠义水浒传钞译》、《水浒传批评解》、《而言解》、《色香歌》、《剧语审译》、《唐人问书》、《崎港闻见录》、《南山考讲记》、《常话方语》、《唐话纂要六卷》、《唐音雅谷语类五卷》、《唐译便览五卷》、《唐话使用六卷》、《两国译通》、《唐音和解》、《唐音世语》、《语录字义》、《宗门方语》、《碧严录方语解》、《八仙卓燕式记》、《徒杠字汇》、《俗语解》、《俗语解》（静嘉堂本）、《明律考》、《应氏六帖》、《水浒传译解》、《忠义水浒传（语解）》、《忠义水浒传（语释）》、《水浒传字汇外集》、《公武官职称名考》、《词略》、《奇字抄录》、《杂纂译解》、《字海便览》、《小说字汇》、《训义抄录》、《支那小说字解》、《中夏俗语藪》、《汉字和训》、《授幼难字训》、《学语编》、《粗幼略记》、《华语详译》、《官府文字译义》、《俗语译义》、《游焉社常谈》、《华学圈套》、《（崎阳照照子先生）译通类略》、《译通类略》、《译

143 日本汲古书院，1971—1976 版。

官杂字簿》、《满汉琐语》、《杂字类译》、《中华十五省》、《译家必备》、《水浒传记闻》、《水浒传记抄解》等63部辞书，为研究近代汉语提供了很大便利。

木村晟所编的《古辞书研究资料丛刊》，已由日本大空社出版。该《丛刊》共分31卷，收录《聚分韵略》、《平他字类抄》、《文凤抄》（含古写本二种）、《色叶字平它》、《色叶集》、《伊露葩字》、《新韵集》、《和训押韵》、《韵字记》、《汉和三五韵》、《和汉新撰下学集》、《法花文句难字书》、《法华经文字声韵音训篇集》、《新撰类聚往来》、《延命字学集》、《节用残简》、《快言抄》、《（雅言俗语）俳谐翌桧》、《假名文字遣》（含天正六年写本和无刊记本）、《运步色叶集》、《日本一鉴》、《方言类释》、《幼学指南抄》、《类源语抄》、《续源语类字抄》、《古节用篇（和名集）》、《北野天满宫藏佚名古辞书》、《万叶类叶抄》、《连歌至宝抄》、《要略字类抄》、《略韵》、《童蒙颂韵》、《伊吕波韵》、《和语韵略》、《和歌初学抄》、《八云御抄》、《藻盐草》、《国籍类书字书》、《字书（名汇）》、《词叶新雅》等41种日本珍贵古辞书，对于训诂学研究者而言也是难得的参考文献。

杉本つとむ所编的《异体字研究资料集成》，包括伴直方的《国字考》、山本安格的《和字正俗通》、洛东隐士的《正俗字例》、松本愚山的《省文纂考》、松井义的《古今字样考》、长梅外辑、长三洲校、长古雪书的《古今异字丛》、湖东布山的《俗书正讹》、一心院响誉上人口说、恬养补的《刊谬正俗字辨》、黑柳勲的《俗字略字》、萩原秋岩的《别体字类》、比丘圆一的《瑠玉集》、新井白石的《同文通考》、太宰春台的《倭楷正讹》、冈本保孝的《倭字考》、中根元圭的《异体字辨》¹⁴⁴、云石堂寂本的《异字篇》、近藤西涯的《正楷录》、小此木观海的《楷法辨体》、石野正永的《拔萃正俗字辨》、狩谷望之的《和名类聚抄笺注异体字辨》等，对于研究汉语中的异体字和俗字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日本现当代所编的汉和词典中，规模最大的当推诸桥辙次主编的《大汉和辞典》¹⁴⁵。该书收单字48,900个（连补遗为49,964个），附有篆文10,100个，词语526,500条，收录插图2,800幅。它以《康熙字典》为基础，但加收了中国古代其它字书的字和一些日本国字。该书的编排是以单字带复词、成语，单字按部首排列，其下复词以日语五十音顺为序。附有笔画、字音（按日文音序排列）、字训（按日文字义排列）和四角

144 杉本つとむ所编著的《异体字辨的研究及其索引》（日本文化书房博文社，1972年），可供参考。

145 日本大修馆书店1955—1960年版，精装12册，附索引1册。1966—1968年出缩印本；1974年出修订本；1984—1986年出最新修订本。2000年又出版了《大汉和辞典补卷》。另有1990年出版的《大汉和辞典语汇索引》。

号码等4种索引。该书的字形以《康熙字典》为依据，并参考《说文解字》、《尔雅》、《玉篇》、《字汇》、《正字通》等古代字书，然后作出统一的决定。揭示篆书，慎重究明六书之本义。字义解释以平易确切为主，明标出处，举应用实例，并究明音义通用文字的相互关系。同一文字有异体、俗体者亦加列举。单字的注音包括日语假名、汉语注音符号、拉丁字母拼音，并标注声调和《集韵》等韵书的反切以及韵部；有几种音义的字，注音分列几项，和释义相对应。字头之下还列有小篆、古文等书体。此外有“名乘”、“解字”和“参考”诸项。“名乘”项专门注明该汉字用作日本人名时的特殊读法。“解字”项主要说明象形、指示、会意三种字的结构和本义，并阐述各种引申义发生的经过。“参考”项说明字形、字音、字义的疑义或异说等，除了补充本字释义之未尽，还举出字形类似易误的字，并辨其异同。该书乃目前规模最大的以汉字为主的大辞典，虽用日文解释，但它以汉字为词头，征引材料主要来自中国古籍，故可作为汉语词典使用。该书征引资料广博，收录了大量一般辞书查不到的字词，包括人名、别号、地名、年号、官名、书名、称谓、成语、典故、格言、俗语以及普通词语、专科术语等等，在训诂学研究中十分有用。编纂《汉语大词典》和《汉语大字典》时，均将《大汉和辞典》列为重要参考书之一。当然，该书在征引材料等方面也有一些不足之处。

第四，日本汉学界对中国古籍索引非常重视，结合有关学术研究编制了大量中国古籍索引。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出版的中国古籍索引约占世界各地所出版的全部中国古籍索引的80%，仅唐代文学古籍索引就达38种，其对中国古籍索引的重视程度可想而知。这是日本学者在中国古籍整理研究领域最突出的成果。¹⁴⁶

日本编制的中国古籍索引门类繁多，几乎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其中许多索引对训诂学研究帮助甚大，如斯波六郎等编制的《文选索引》、太田辰夫编制的《敦煌变文集口语语汇索引》、原田种成编制的《搜神记语汇索引》、饭田吉郎编制的《元曲常用语汇索引》和《董西厢语汇引得》、东京文理大学汉文学第二研究室编制的《还魂记语汇引得》、太田辰夫编制的《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话本语汇索引》、古屋二夫编制的《武王伐纣平话·七国春秋平话语汇索引》、鸟居久靖编制的《瓶外卮言语汇索引》和《古谣谚语索引》（合编）、佐藤仁编制的《朱子语类自第一卷至第十三卷语汇索引》、盐见邦彦编制的《朱子语类口语语汇索引》、西冈弘编制的《游仙窟索引》、

146 参见拙作《试论日本所编的中国古籍索引》，《文献》2005年第2期。

大岛仲太郎编制的《妙法莲华经索引》、日本东洋哲学研究所编制的《法华经一字索引》¹⁴⁷和《维摩诘经·胜鬘经一字索引》、柳田圣山编制的《祖堂集索引》、太田辰夫编制的《祖堂集口语语汇索引》、山田孝雄编制的《玄应一切经音义索引》、神尾壹春编制的《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索引》、山田利明等编制的《太上洞渊神咒经语汇索引》、藤田至善编制的《后汉书语汇集成》、小野川秀美编制的《金史语汇集成》、田村实造编制的《元史语汇集成》等。波多野太郎在中国古籍索引编制领域亦功绩卓著。他编制的《中国小说戏曲词汇研究辞典·综合索引篇》，是对在日本德川时代、明治年间到昭和时代编印的有关中国小说戏曲资料的语汇综合索引。该索引详注出处，检索方便，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和训诂学极有用处，是一部高质量的工具书。《中国方志所录方言汇编》(第1—9编)亦系波多野太郎所编。该书将中国地方志中有关方言的部分加以汇编影印，每编卷末附有该编所收方言词汇的索引。卷首有一导言，叙述方志中所录方言词汇的语言学价值。该书将有关方言资料按地区汇聚地一起，并编制了索引，检索方便，故可作为一部语词索引来使用。该书对于汉语方言研究及辞书编纂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近年由日本魏书研究会编制的《魏书语汇索引》，耗时近30年，精装一巨册，采录(北齐)魏收撰《魏书》中的人名、地名、王朝名、民族名、书名等固有名词，官职、法律、仪礼等与制度有关的用语，与政治和社会经济有关的重要用语，动植物名、器物名、自然现象、人物评价等，以及属于普通名词的用语编制成索引，为中古汉语研究者提供了极大便利。大阪市立大学明清文学言语研究会编制了一套中国古典小说、戏曲语汇索引，包括《红楼梦语汇索引》、《金瓶梅语汇索引》、《水浒全传语汇索引》、《儒林外史语汇索引》、《儿女英雄传语汇索引》和《中国古典戏曲语汇索引》等6种，对研究近代汉语甚有助益。它如入矢义高编制的《通俗篇·真语补证·恒言录·方言藻·尔雅综合索引》、西端幸雄编制的《玉篇零卷出典索引》和《原本玉篇零卷、玉篇佚文补正汉字索引》等，均系从事训诂学研究的重要工具书。近年来出版的石川重雄编制的《宋元释语语汇索引》、川岛郁夫编制的《〈元曲选外编〉语汇索引》、渡边洋编制的《〈刘知远诸宫调〉语汇索引》、大岛吉郎《〈红楼梦〉语汇索引》和《容与堂本〈水浒传〉语汇索引》等，在从事近代汉语研究时也颇有用处。此外，日本大藏经学术用语研究会编制的《大正新修大藏经索引》，规模宏大，乃研究佛经词汇的重要工具书。

147 一字索引即逐字索引，日本一般称为一字索引。

此外,日本还出版了一些中国古籍专书词典。如辛岛静志编纂的《正法华经词典》,收入了竺法护译《正法华经》中佛教词、音写词、口语词等为中心的4千多条词语。在每个条目中,除了详细标明该词条出自《正法华经》(载《大正新修大藏经》第9卷)第几页第几段第几行外,还注明了该词条的现代汉语拼音和英语翻译,在《汉语大词典》和《大汉和辞典》中的页码以及最早的书证,并且附上了梵本《正法华经》(Kern-Nanjio校刊本及中亚出土写本)以及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载《大正新修大藏经》第9卷)中的对应词。此后,辛岛静志又编纂了《妙法莲华经词典》,体例与《正法华经词典》相同。作者还将继续编纂其它汉译佛典的词典,最终将它们汇总在一起,编一部以汉译佛典为材料的《佛典汉语词典》。上述带有索引性质的词典对于佛经词汇及中古汉语研究非常有用。

第五,众所周知,日本藏有大量中国古籍,内含明代及明代以前的善本近9千种,仅唐人写本就有至少32种。¹⁴⁸其中有不少典籍已在中土亡佚,弥足珍视。这些典籍大多直接或间接与训诂学研究有关。如晚清光绪年间黎庶昌和杨守敬从日本辑刻的《古逸丛书》,收录了多种在中土失传已久的逸书。其中的影旧钞卷子原本《玉篇》是我国第一部以楷书为正体的字书,释义完备、例证丰富,词义不明的,还有顾野王按语,并赖以保存了多种亡佚已久之书,宜倍加珍视;¹⁴⁹《韵镜》是现存韵图中最古老的一种,至今仍是音韵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典籍。此外,《古逸丛书》中还有多种日本收藏而中国罕见的隋唐写本和宋元刻本。内中的影宋蜀大字本《尔雅》,乃现存《尔雅》单注本中一个较早的本子,具有较高的校勘价值;覆宋本重修《广韵》和覆元泰定本《广韵》,为考究《广韵》的版本源流提供了重要依据,在音韵学和校勘学上亦很有参考价值。

《集韵》现存三种宋刻本,一是南宋初年明州(今浙江宁波)所刊,经南宋中期修补印行的本子,是《集韵》传世最早的刊本,也是清代以来通行诸本的祖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3年影印出版。二是南宋孝宗时湖南刻本,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收入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出版的《古逸丛书三编》中。三是南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金州(今陕西安康)军刻本,藏于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该本以蜀本为底本,校之以中

148 参见严绍璎《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

149 朱葆华所著的《原本玉篇文字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对原本《玉篇》中的合并字、新增字、异体字和常用字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考察,乃关于原本《玉篇》研究的首部专著,从该书中可以较为充分地了解原本《玉篇》之价值。

原旧本，并用《说文》、《尔雅》等书纠谬。由于该本深藏于日本皇宫，故中国国内学者长期以来仅能依据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诸书方可窥其一斑，却少有睹其全貌者，以致对它产生种种猜测和误解。其中之一便是认为国图与宫内厅的两个本子系《集韵》的同一重刻本。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金州本和湖南本均刊刻于南宋孝宗年间，而两本行款格式又大致相同。但经过仔细考辨，可断定金州本和湖南本绝非同一版本。日本宫内厅所藏金州军刻本的价值，除了在于它是不同于通行本系统的一个详加校订的宋刻本之外，还在于它有保存完好的牒文、衔名和跋文，为后人提供了关于《集韵》一书的宝贵历史资料。它清楚地表明了《集韵》的编撰及刊刻年代，可纠《四库全书总目》之误，尚可补由于其它版本牒文残缺而造成的《集韵》成书及刊刻问题不详之遗憾。它还显示《集韵》的宋刻本除我们所知的之外，尚有蜀本、中原本等，只是与庆历原刊同样不存于世了。令人遗憾的是，现存日本宫内厅书陵部的《集韵》金州军刻本已非完璧，缺首卷，仅存二至十卷。该书已收入《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影印丛书》（第一辑），由中国线装书局于2001年据原版缩小影印。¹⁵⁰

中国大陆所藏的《大宋重修广韵》之宋刻本，仅有国家图书馆的宋绍兴年间残本3卷，然而日本却保存了该书的宋刻本6种（全本5种，残本1种），其中国会图书馆藏有宋光宗（1190—1194年）、宋宁宗（1195—1224年）时代临安刻本《大宋重修广韵》5卷，宫内厅书陵部、静嘉堂文库和龙谷大学附属图书馆藏有宋宁宗年间（1195—1224）浙中覆宋孝宗时刻本《大宋重修广韵》5卷，国家公文书馆第一部（原内阁文库）藏有宋乾道五年（1169）黄三八郎《巨宋广韵》5卷，名古屋大须观音（原真福寺）宝生院藏有北宋末期刻本《大宋重修广韵》残本1卷¹⁵¹。同时，日本的庆应义塾大学附属研究所斯道文库藏有宋末元初刻本《广韵》5卷，日光轮王寺藏有金刻本《广韵》5卷，天理图书馆藏有元延祐二年（1315）圆沙书院刻本《广韵》5卷，国家公文书馆藏有元覆宋刻本《大宋重修广韵》残本4卷（缺第1卷和第2、3卷首页），大谷大学悠然楼藏有元至顺元年（1330）敏德堂刻本《广韵》5卷，米泽市市立图书馆藏有元元统三年（1335）日新书堂刻本《广韵》5卷，尊经阁文库、静嘉堂文库和龙谷大学附属图书馆

150 参见《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影印丛书》第一辑《集韵》影印说明，中国线装书局，2001年。

151 即5卷本中的第3卷，系现存最古之《广韵》刻本。

藏有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南山书院刻本《广韵》5 卷，国家公文书馆藏有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南山书院刻元至顺庚午（1330）配补本《广韵》5 卷和元刻本《明本正误足注广韵》5 卷，东洋文库藏有元刻本《广韵》5 卷，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藏有元刻本《广韵》残本 3 卷（即 5 卷本中的第 3、4、5 卷，每卷首尾皆缺）。此外，日本早稻田大学附属图书馆、京都高山寺、滋贺石山寺、东京大东急纪念文库、京都大福光寺分别藏有唐人写本《玉篇》残本第 9 卷、第 27 卷之前半部、第 27 卷之后半部、第 8 卷“心部”之碎片、第 24 卷“鱼部”之碎片，大阪杏雨书屋藏有唐人写本《说文解字》残卷（即“木部”188 字），奈良正仓院藏有唐人写本《一切经音义》残本 1 卷（即第 6 卷），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有唐长寿三年（694）李元惠写本《妙法莲华经》7 卷，宫内厅书陵部藏有唐人写本《妙法莲华经》8 卷，东京御茶之水图书馆藏有唐人写本《妙法莲华经》残本 1 卷（即 7 卷本中的第 7 卷），大阪府立图书馆藏有唐乾元二年（759）唐人写本《妙法莲华经》残本 1 卷（即 7 卷本中的第 3 卷），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藏有宋一经堂刻本《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60 卷和《附释音毛诗注疏》20 卷，名古屋大须观音宝生院藏有宋刻本《礼部韵略》残本 3 卷（即 5 卷本中的第 1、3、5 卷），¹⁵²均为音韵学研究弥足珍贵之第一手资料。¹⁵³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鲁国尧先生于 1990 年秋在东京从事合作研究时，在日本国会图书馆发现了《卢宗迈切韵法》这一字内孤本。鲁先生将宋代音韵学史作为广阔的背景，对《卢宗迈切韵法》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撰成长达 3 万字的论文。该文全面阐发了《卢宗迈切韵法》的学术价值，指出该书是宋代等韵学的一个派系的资料之汇集，不仅在汉语音韵学史上有珍贵的学术价值，而且也为汉语语音史提供了若干宋代的语音资料。¹⁵⁴

此外，在日本有“和刻本”这一名词，其概念与“日本刻本”不同，一般是指日本刻印的中国汉籍。“和刻本”这一日本文献学名词在中国尚不通行。中国学界一般称此类版本为“日本本”或“东洋本”。但近年来和刻本已逐渐引起中国学者的重视。《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王宝平主编）已由杭州大学出版社于 1995 年刊行，收录中国内地 68 家图书馆所藏日本明治年间及明治以前刻印、抄写的中国著者之书和日本著

152 参见严绍璁：《日本藏汉籍珍本追踪纪实——严绍璁海外访书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

153 参见丁锋：《〈大广益会玉篇〉删改〈玉篇〉增补内容考——兼谈各国所藏〈玉篇〉残卷的版本问题》，日本《海外事情研究》第 32 卷第 2 号（2005 年）。

154 参见鲁国尧：《〈卢宗迈切韵法〉述评》，载《中国语文》，1992 年第 6 期、1993 年第 1 期。

者的注校、研究中国古籍之书，大正、昭和时期的影印本亦间有收录，其中“经部·小学类”收书 118 种，仅（唐）释智广撰《悉昙字记》一卷就有日本庆安元年（1648）刻本（有日本识语）、万治三年（1660）刻本、宽文八年（1668）京都文政堂刻本、宽文九年（1669）平安书林菊屋源兵卫刻本、文政年间（1818-1830）刻本、天保四年（1833）东叡山刻本等 7 种版本，以及日本中野宗左卫门刻本《悉昙字记指南钞》六卷（日·释佚名注）；关于《尔雅》的则有日本翻刻宋本《尔雅》三卷、日本天保十五年（1844）松崎氏羽泽石经山房影刻宋本《尔雅》三卷《音释》三卷《校讹》一卷（日·松崎复校编）、日本影刻清嘉庆六年（1801）南城曾氏艺学轩影宋绘图本《尔雅》三卷、日本文久二年（1862）积玉圃刻本《尔雅注疏》十一卷、日本翻刻明万历本《尔雅注疏》十一卷等 5 种；关于《韵镜》的有日本宽永十八年（1641）田原仁左卫门翻刻享禄宣贤本《韵镜》一卷、日本翻刻宋庆元三年（1197）《韵镜》一卷、日本铜驼坊书肆长尾平兵卫刻本《韵镜》三卷《韵镜遮中钞》一卷等 3 种不同的版本，另外（日）释宥朔撰《韵镜开卷》六卷，同时还有日本宽永四年（1627）刻本和日本宽永四年刻万治二年（1658）印本。经考证，《韵镜》在宋淳祐十二年（1252）之前传入日本。该书在日本流布甚广，版本众多，主要有写本、刻本和活字本三大系统。除了上述版本之外，写本较早的有建长四年（1252）明了房信范复写本、元德二年（1332）本、嘉吉元年（1441）本、延德（1489-1491）识语本、文龟（1501-1503）本、天文十年（1547）和元龟（1570-1572）本；刻本较早的有享禄元年（1528）本、永禄七年（1564）本、庆长十三年（1608）本和宽永五年（1628）本等；活字本有庆长十三年（1608）古活字本以及覆刊本、整刊本等。日本宽永年间之后，《韵镜》研究非常兴盛，业已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各种研究著作多达 250 余种。《韵镜》所代表的汉语中古音系统的唐宋时代之语音，已逐渐被日语所吸收，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¹⁵⁵《韵镜》作为《古逸丛书》之一种，于清光绪十八年（1892）随《古逸丛书》一同回归故土。百余年来，中国学者对该书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在校勘方面，有龙宇纯的《韵镜校注》¹⁵⁶和李新魁的《韵镜校证》¹⁵⁷。前者有校记 838 条，后者有校记 1,219 条。研究专著有孙仲

155 有关日本历代学者研究《韵镜》的成果，可参考[日]福永静哉：《近世〈韵镜〉研究史》，日本风间书房，1992年；李无未：《日本学者的〈韵镜〉研究》，载《古汉语研究》，2004年第4期。

156 台湾艺文印书馆，1959年。

157 中华书局，1982年。

温的《韵镜研究》¹⁵⁸。陈广忠的《韵镜通释》¹⁵⁹作为通论性的研究著作，对《韵镜》中涉及的所有问题进行了全面而又系统的诠释。有关《韵镜》研究的论文，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包括与《七音略》、《切韵指掌图》的比较研究，对日本版本的研究，对重组的研究，对时代的研究等等。¹⁶⁰中日学术交流对音韵学研究的重要作用，从《韵镜》一书即可窥见一斑。

由于和刻本与中国本土刻本往往有所不同，因而和刻本在汉语史研究中有时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常常会有意外的收获。但由于条件所限等种种原因，和刻本尚未受到中国汉语史研究者的充分重视。

158 台湾学生书局，1987 年。

159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年。

160 参见陈广忠：《〈韵镜〉——古代音位理论的结晶（代序）》，载《韵镜通释》卷首，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年。

会议动态

新世纪汉语研究暨浙江语言学研究 回顾与前瞻国际高级论坛综述*

2005 年 10 月 17 日至 21 日，“新世纪汉语研究暨浙江语言学研究回顾与前瞻国际高级论坛”在杭州玉皇山庄举行。此次会议由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浙江省语言学会、浙江师范大学、浙江工业大学、宁波大学、绍兴文理学院、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等单位共同举办。共有 60 余位来自日本、台湾、北京、上海等地的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其中包括在海内外语言学界享有盛誉的著名语言学家胡明扬、鲁国尧、裘锡圭、王宁、沈家煊、徐通锵等先生。会议共收到论文四十余篇。此次国际高级论坛的与会者主要是浙江籍的语言学家以及与浙江关系密切的学者，大家共聚美丽的西子湖畔，不分流派、不分背景、也不分领域，一起回顾和展望新世纪汉语暨浙江语言学研究，这是一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兼容并包的学术盛会。

会议的主要议程如下：

* 本次会议部分费用由浙江大学汤永谦学科建设发展基金 (Y. C. TANG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Fund, Zhejiang University) 资助

10 月 17 日代表报到。

10 月 18 日上午 8:30 至 9:20 举行开幕式, 由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主任方一新教授主持。方一新教授代表主办方介绍出席会议的领导和专家学者。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陈永昊先生, 浙江大学副校长胡建淼教授, 浙江大学古籍所所长、汉语史中心副主任、浙江省语言学会会长张涌泉教授分别代表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浙江大学、浙江语言学会对出席论坛的海内外专家表示热烈的欢迎,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沈家煊教授代表来自外省的的语言学家对主办方表示感谢, 并祝愿此次论坛圆满成功, 也祝愿浙江省的语言学有更大的发展, 为全国的语言学作出更大的贡献。

10 月 18 日上午 9:30 至 11:45, 大会发言开始, 由浙江大学古籍所王云路教授、绍兴文理学院王建华教授共同主持, 九位德高望重的先生分别作了精彩讲话。中国人民大学语文系胡明扬教授首先发言, 他指出, 浙江经济发达, 文教昌盛, 自古语言学人才辈出。无论在传统语言学领域, 还是现代语言学理论方面, 浙江语言学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然而也存在缺憾, 当前, 从全国范围来看, 传统语言学后继乏人, 对古籍熟悉的人不多, 古汉语教学也存在很多问题。对此问题, 胡先生建议应该专门关注传统语言学的问题, 好好继承我们的传统, 集合全国的师资, 培养出更多更优秀的传统语言学和现代语言学人才。继而, 浙江大学中文系王维贤教授谈到两个具体的语言学问题。第一, 语法语义关系问题。王先生认为, 汉语语法研究应该重视意义, 不要拼命去找印欧语形式, 而应把形式和意义结合起来。第二, 语法跟语境的问题。王先生指出, 语言作为一种交际的工具, 是在一定语境中来进行的。语法在语境的限制下会有不同的形式, 不同的表达方式, 可以结合语境探寻一定语言条件下形成的不同形式。第三位发言的是南京大学中文系鲁国尧教授。鲁先生的报告题目为《陶宗仪与元代语言》。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笔记书, 该书为研究元代语音、词汇提供了大量资料。鲁先生以《辍耕录》为主, 兼及《书史会要》, 阐述了陶宗仪著作对研究元末明初语言的作用。第四位发言的是复旦大学中文系裘锡圭教授, 谈及对章太炎的看法。裘先生认为, 清末民初是文化发展史上新旧交替承前启后的重要时代。

许多浙江名人与国学、与这个时代有关，譬如章太炎、孙诒让、王国维等等。现代学术界对章太炎承前的一面较为重视，启后往往忽略，甚至有人将其与新的语言学对立起来。裘先生以音韵学、方言研究等方面为例说明了章太炎对现代语言学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接下来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王宁教授畅谈怎样对待古代语言学遗产的问题。主要涉及三点：第一，批判的弊病。中国语言学是在传统的小学、社会主义的苏联语言学以及近现代的西方语言学这三个渊源发展而来的，然而，这三方面都曾经被盲目地批评过，最严重的一个后果就是中国传统语言学后继乏人。因此我们反对盲目的批判。第二，还原的重要。没有继承也就没有今天新的创新，先要还原而不要急于去批判，因为只有还原了，我们才知道哪些是有用的，哪些是应该摒弃的。第三，要不要走自己的道路。汉语语言学是有自己的特殊性的，我们应该用自己对汉语特点的研究，再提升和总结它的普通性。第六位发言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徐通锵教授，题目为《汉语特点的研究和语言理论建设》。徐先生指出，语言理论研究的基本要求是通过语言特点的研究去追溯语言共性的结构原理。汉语的特点凝聚于字，应以字的研究为基础去探索隐蔽于它背后的语言共性结构原理，实现传统与现代、与国际的两个接轨。第七位发言人为日本二松学舍大学研究院佐藤进教授，他的题目是：卢文弨所见宋刊《方言》考。卢文弨为浙江人，精于校勘，卢氏的《重校方言》是后来研究《方言》者不可缺少的重要参考文献。佐藤先生通过大量例证，指出卢氏所见李孟传本即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宋抄本，而静嘉堂文库所藏宋抄本《方言》的学术价值相当高，说明了卢氏校雠的先进性。第八位发言的是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潘悟云教授，谈及方言学的研究问题。潘先生指出，方言学从赵元任到丁声树、李荣先生，到现在为止，方法大致是一脉相承的。方言学要想有所发展的话，必须要有所创新，还要有自己新的方法和工具。例如方言学的数字化，使方言材料的规则、分布可视化，制成地图后，再进行分析结论就会客观得多。最后一位发言的是暨南大学中文系邵敬敏教授，题目为《浙江学者对现代语言学研究的贡献及其特色》，文章从历史与现实两个角度观察浙江籍的语言学家对中国现代语言学的贡献以及特点，并指出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发展的

趋势，可谓高屋建瓴式的阐述与总结。

分组讨论共6场，分为古代汉语组与现代汉语组。

古代汉语组：

第1场（18日13：30—15：00）由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孙力平、浙江大学汉语史中心黄笑山共同主持，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董志翘教授、日本北海道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池田证寿教授、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竺家宁教授、日本北海道大学文学研究院松江崇先生、日本东京都立大学小方伴子先后发言。董志翘先生在《汉语词汇研究与敦煌社会经济文书的整理》一文指出，敦煌社会经济文书收罗宏富，内容覆盖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但是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敦煌社会经济文书的整理比较薄弱，书中讹误较多的一个原因就是对其中的词语缺乏深入的研究，董先生通过举例说明了词汇研究对于整理敦煌社会经济文书的重要性。池田证寿先生的《依据日本的古字书来从事汉语史资料研究》谈到，在日本，以中国方面的字书作为资料，利用万叶假名和片假名、日本汉字音及日语的对照汉字字书被大量的编辑。池田先生以《类聚名义抄》为例，论述此书作为汉语史研究的价值。竺家宁先生的《明代声母演化的类型及发展》一文，从断代角度考察明代声母的具体发展状况。在搜寻明代声母研究的原始材料方面，除了《续修四库全书》经部小学类当中的资料，还包括收藏于台湾各图书馆的善本书与线装书。一方面把现代学者在近代音方面有关声母的研究成果作一讨论，一方面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个人的观点与心得。松江崇先生在《上古中期禅母系疑问代词系统中句法分布的互补现象》提到，上古汉语中的代词系统与中古以后相比具有明显的特征，一是上古代词原则上都是单音节，二是同时存在着几个指示对象相同或相近的代词，且这类代词往往具有音韵上的共同点。他以《左传》《国语》《论语》《孟子》《吕氏春秋》中的禅母系疑问代词“孰”与“谁”作为语料，从共时与历史平面对其进行分析，并对此互补现象的生成过程及其机制，提出一种假说。小方伴子的《左传》的“夺+N1+N2”结构和“夺+之+N”结构一文，考察了《左传》里的“夺”字结构，认为“夺”和典型的（+给予）与格动

词“与”在语义上呈现对应关系、语法上也有一定的平行性。

第2场(18日15:15—17:15)由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董志翘教授、宁波大学文学院周志锋教授共同主持,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黄征教授、首都师范大学洪成玉教授、宁波大学文学院宋闻兵教授、绍兴文理学院中文系杨福泉教授、杭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汪少华教授、台州学院人文学院胡正武教授先后发言。黄征先生在《“切藉”考》一文中,从“切藉”的字形上,结合上下文语境等方面作了一番考证,认为季布诗咏“切藉精神大丈夫,奈何今日天边输”中的“切”可能是错字,应为“项”,而“藉”在敦煌写本中可作“籍”,故“切藉”应为“项籍”。洪成玉先生在《对计算语言学的瞻望》一文中指出,计算语言学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和美好的发展前景,有可能带动整个语言学的发展。它的介入,很快就显现语言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如对语义、对词组的研究。计算语言学发展的过程,是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是不断提高计算机处理自然语言能力的过程,而且还可能是对语言理论、方法等取得突破的过程。宋闻兵先生的《读〈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札记》一文,从词汇史的角度对《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所收墓志的词语展开研究,着重探讨了“桃年”“脱巾”“高尚”“直置”等词语的词义及其词汇史价值,并通过对相关墓志拓本的再考察,就书中部分墓志的录文提出商讨性意见。杨福泉先生的《“藏之名山”补正》一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名山”原指群玉山,所谓“藏之名山”,不妨可以理解为“书之玉版,藏之石室”,而“名山”作为官家书府之雅称,是用了借代的修辞手法。汪少华先生的《上古车舆名物考辨》,以名物线索贯穿训诂学、考古学和科技史,吸收考古研究成果来解决车舆名物训诂疑难;凭借训诂利器,对现代考古研究中车舆马具定名进行研究,评判各家歧说,订正了对文献及其注释误解或传说而导致的失误。胡正武先生的《“蓐食”历时性考察与训释浅说》一文,从古代文献中有关蓐食的用例出发,认为杜预之释为是。“蓐食”一词多用于军队行军作战,多属于“非常之事”之前的准备工作;即使民众生活中的“蓐食”也每有非常行动,故“蓐食”属于“非常食”、“早食”。

第3场(19日14:00—17:00)由浙江大学汉语史中心俞忠鑫教授、湖州师范学

院俞允海教授主持。浙江大学汉语史中心的祝鸿熹教授、黄金贵教授、俞忠鑫教授、黄笑山教授、姚永铭副教授、许建平教授先后发言。黄金贵先生的《〈庄子·秋水〉“望洋”新诂》一文，剖析了“望洋”从上古至后世的诸多用例，认为“望洋”的本义是定睛上视貌，引申为定睛高远视义，有心志、抱负者眼相。《庄子》“望洋”今皆误连“向若而叹”，当连上“目”而“目望洋”成句，此“望洋”用为本义。俞忠鑫先生的《规范汉字和汉字规范》一文指出，规范汉字应该是指书写正确、可以作为标准的汉字。而精简数量、简化笔划、由政府部门公布而规定使用的汉字应该叫做“规定汉字”，而不是“规范汉字”。规定汉字不一定是规范汉字，汉字的规范工作任重而道远，而汉字规范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对《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和《简化字总表》作全面的清理和规范。姚永铭先生的《〈俗务要名林〉校补》一文，针对《俗务要名林》录文在校勘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探讨。许建平先生的《唐写本〈周易经典释文〉校议》，在前人考校的基础上，以国家图书馆藏宋刻宋元递修本《经典释文》与唐写本对勘，于前人失校、误校者详加校证。

现代汉语组：

第 1 场（18 日 13：30—15：00）由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研究所曹志耘教授、浙江师范大学文学院张先亮教授共同主持，北京大学中文系王福堂教授、北京语言大学曹志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郑张尚芳教授等先后发言。曹志耘先生的《汉语方言地图集研究计划简介》介绍了该研究计划的背景、主要内容、主要成果、工作步骤及进展等问题。“汉语方言地图集”研究计划以语言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为指导，借鉴国外方言地图集的编制经验，采用最新的现代化技术手段，拟在全国汉语地区选择约 1000 个地点，以 1931—1945 年之间出生的人为调查对象，根据统一的要求，对汉语方言中那些能够反映地域差异和历史演变的重要语言现象进行实地调查。郑张尚芳先生的《浙籍语言学家方言研究的成就》一文指出，浙江历史上就是出语言人才的地方。《中国现代语言学家传略》中收录浙江籍语言学家 56 人，健在的 24 位中就有 10 位是研究或研究过方言的，足见浙江丰富的方言环境对培育语言学者所产生的巨大影

响。郑张先生用浙北吴语、浙南吴语、非吴语三节分别详细叙述了方言研究取得重大成就。

第2场(18日15:15—17:15)由厦门大学人工智能研究所周昌乐教授、浙江教育学院徐颂列教授共同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吴安其教授、绍兴文理学院中文系侯友兰教授、温州大学人文学院马贝加教授、浙江大学汉语史中心彭利贞教授、湖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俞允海教授等先后发言。吴安其先生的《汉语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谈到,汉语史研究中“依据的材料”、“起源与早期的传播”、“方言的交替”及“语音史”、“语法史”等是密切相关的问题。我们应考虑,舍弃了历史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我们是否有其他的理论和方法可以支撑汉语史的研究。侯友兰先生在《〈越谚〉的构成》一文中指出,《越谚》不仅仅是越地谚语的辑录,而是一本熟语词典,它以记录口头俗语为目的,对于方言词语、谚语以及歌谣,完全照口头传唱著录,不避土音俗字。因此,保存了越中方言、谣谚的第一手资料,是我们了解越方言、越文化的难得的语料。马贝加先生的《瓯语“是刺”研究》,通过对瓯语中高频词“是刺”进行组合能力的考察和描写,说明瓯语动词的“体”是可以凭借形式标志观察的;瓯语动词持续性的有无、强弱和动态、静态的划分也是有形式标志可以依据的。彭利贞先生的《论情态与情状的互动关系》一文以大量例证说明,情态与动词和句子的情状特征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不同情状类型与不同情态意义类型之间的存在匹配上的互动关系,表现为属于不同情状类型的动词与表达不同类型情态意义的情态动词之间的共现限制。俞允海先生的《关于汉语研究的反思——兼论中外语言学研究的不同》一文指出,中西方的语言学研究都是源远流长的,相同的实用主义目的促进了语言学的发展。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中西方的语言研究发生了很大的不同。俞先生详尽论述了中西方语言研究的同异,并进一步阐述了汉语研究的思路。

第3场(19日14:00—17:00)由温州大学人文学院马贝加教授、浙江大学汉语史中心陈忠敏教授共同主持,浙江大学汉语史中心池昌海教授、陈忠敏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沈家煊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徐通锵教授、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

潘悟云教授先后发言。陈忠敏先生的《论吴语衢州片方言齐韵的今韵母读音层次——兼论语音层次对应的原则》一文分为四个部分：开化方言齐韵今韵母读音层次、跟衢州片里其他方言点的层次对应、衢州片齐韵韵母多层读音的来源、衢州片齐韵韵母多层读音在其他吴语及邻近方言里的扩散情况，详尽分析了衢州片方言齐韵的今韵母读音层次并论述了语音层次分析、语音层次对应的原则。之后，各位先生围绕该文纷纷谈了自己的想法。

本次论坛具有如下鲜明特点：

一、主题兼容并包，局部整体互渗

本次论坛的主题为“新世纪汉语研究暨浙江省语言学回顾与前瞻”，这样的提法本身就具有一种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学术气度。从与会者提交的论文来看，涵盖面广，内容丰富。既有对浙江语言学的回顾与前瞻，也有以浙江语言学研究为个案，以点带面地辐射到对汉语研究整体状况的回顾暨展望。前者如裘锡圭先生谈对章太炎的看法，鲁国尧先生的《陶宗仪与元代语言》，佐藤进先生的《卢文弨所见宋刊〈方言〉考》，邵敬敏先生的《浙江学者对现代语言学研究的贡献及其特色》以及郑张尚芳《浙籍语言学家方言研究的成就》等论文；后者如吴安其先生的《汉语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洪成玉先生的《对计算语言学的瞻望》、俞允海先生的《关于汉语研究的反思——兼论中外语言学研究的不同》等。

二、宏观微观兼顾，理论实践并重

本次论坛涉及领域广泛，研究方法多样，既有宏观的纯理论的探讨，也有对文字、词汇、语法等具体语言现象的深入研究。如王宁先生畅谈怎样对待古代语言学遗产，视野开阔，是一种高屋建瓴式的理论阐释。徐通锵先生的《汉语特点的研究和语言理论建设》，通过语言特点的研究去追溯语言共性的结构原理，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潘悟云先生关于方言学研究的数字化问题的研究等新理论新方法的提出，对汉语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微观研究方面，汪少华先生的《上古车輿名物考辨》、黄金贵先生的《〈庄子·秋水〉“望洋”新诂》等论文，以细致入微的分析对文字、词汇作

出了精湛的考释。此外，日本学者的汉语研究也颇为引人注目。池田先生的《依据日本的古字书来从事汉语史资料研究》、松江崇先生的《上古中期禅母系疑问代词系统中句法分布的互补现象》以及小方伴子的《〈左传〉的“夺+N1+N2”结构和“夺+之+N”结构》，利用汉语文献材料进行汉语史的研究，其分析之缜密令人佩服。

三、气氛宽松和谐，同乡以文会友

这次国际高级论坛既是一次学术讨论会，又是一次同乡联谊会。由于与会者多数是浙江籍的以及与浙江有着密切关系的专家和学者，所以会议气氛显得格外宽松和谐。各位同乡齐聚一堂，互相交流，互相渗透，共同回顾和展望 21 世纪语言学尤其是浙江语言学研究领域的成就以及前景，无论在分组讨论之时还是闲暇谈话之际，都能够坦诚相待，畅所欲言，真正做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大家普遍认为，这是一次非常富有创意的语言学队伍的高级聚会。

语言学是浙江省的传统优势学科，经过几代学者的辛勤耕耘，共同努力，在传统的音韵、文字、训诂学方面，在现代的词汇、语音、语法、修辞、方言还有语言理论等方面也是人才辈出，成绩斐然，形成了自己鲜明的优势和特色，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以近现代为例，就有许多彪炳史册的著名语言学家，如俞樾、孙诒让、章太炎、王国维、陈梦家、沈兼士、唐兰、陈望道、陆志韦、张相、陆宗达、张世禄、蒋礼鸿、叶蜚声、李荣等等，又如现仍活跃在学术界的的老前辈，胡明扬、裘锡圭、徐通锵、王宁、赵诚、洪成玉、沈家煊、项楚、潘悟云、游汝杰、邵敬敏等等，可谓群星璀璨。近年来，浙江省的语言学研究在姜亮夫、蒋礼鸿、任铭善、王惟贤、倪宝元、祝鸿熹、郭在贻等前辈学者的引领下，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中青年语言学家和一批优秀的语言学成果，产生了以张涌泉、方一新、王云路、王建华、张先亮、孙力平等为代表的新一代领军人物。浙江省目前的语言学建设老专家老当益壮，中年专家当仁不让，青年才俊崭露头角，发展势头很好，为进一步繁荣我省语言学研究 and 建设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而这次的国际高级论坛是一个很好的彼此间学习借鉴和合作交流的机会，对促进浙江省语言学的繁荣发展必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通过这次会议，我们也认识到，目前的浙江省语言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方言研究、语法研究、语音研究、文字研究、乃至修辞研究，后继乏人，影响不大。我们应该正视这种情况，尽快采取有力措施，在继续保持传统优势的同时，进一步拓宽我们的研究范围和学术视野，促使浙江的语言学研究繁荣昌盛，再创辉煌。

经过两天的发言和热烈讨论，本次论坛圆满结束。

（浙江大学汉语史中心博士生 荆亚玲 执笔）

基地建设

张涌泉教授当选为“浙江省特级专家”

经学校推荐，浙江省特级专家选举委员会评选，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核，省委常委会议同意，浙江省首批特级专家共 30 名 9 月 19 日公布，其中包括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特级专家 6 名，本中心张涌泉光荣当选。

浙江省特级专家是我省设立的最高学术技术称号，每三年评选一次，总人数控制在 100 名以内。实行浙江省特级专家制度，是省委、省政府深入实施人才强省战略，创新高层次人才培养选拔管理机制，加强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的重大举措。评选活动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按照评选标准和条件，经过各地各单位推荐初选，浙江省特级专家评选工作小组组织形式审查、评审、选举，产生了 30 名浙江省特级专家人选。30 名人选经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并报省委常委会确认后，正式当选为浙江省特级专家。

10 月 19 日上午，浙江省特级专家授证大会在省人民大会堂召开。省委书记习近平、省长吕祖善等省委、省政府领导出席了会议。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就实行特级专家制度，推进人才建设的重大意义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并对当选的特级专家提出了殷切的希望。

张涌泉教授 获“全国优秀博士后”荣誉称号

为纪念我国博士后制度建立 20 周年，全国优秀博士后表彰大会 10 月 21 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本中心张涌泉教授等 68 人获得“全国优秀博士后”荣誉称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会见了出席全国优秀博士后表彰大会的代表。温家宝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受到表彰的个人和单位表示祝贺。温家宝指出，我国的博士后制度是在李政道先生的倡议下，邓小平同志亲自决策建立的。20 年来，我国设立了 2318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和工作站，培养了 32000 多名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取得了一批高水平的科研成果，为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创新作出了积极贡献。事实证明，建立博士后制度是完全正确的。

王云路教授当选为 第九届民盟中央委员

2005 年 12 月 6 日至 12 月 9 日，本中心王云路教授到北京参加中国民主同盟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会，在本次会议上，王云路教授当选为第九届民盟中央委员。

学术交流

复旦大学教授裘锡圭先生 来我中心作学术报告

10月17日上午,复旦大学教授裘锡圭先生应邀来我中心作题为“简牍文化在汉语中的遗迹”的讲座。裘锡圭教授是国内文字学界的著名学者,主要从事文字学,古文字学,考古资料与先秦秦汉古籍整理,金文选读和甲骨学方向的研究,先生的讲座吸引了众多师生。讲座上,裘锡圭教授首先简要介绍了简牍的发展历史,基本知识,指出简牍时代虽早已结束,但与简牍文化相关的词语仍大量使用。他以举例的方式,介绍了简牍文化在汉语中的遗迹的三个主要表现方面(1)与写字写文章相关的词,(2)书籍单位用词(3)契约证件用词。谈到研究的意义时,他指出研究简牍文化在汉语中的遗迹对学习古代汉语,正确注释古籍都有益处,不了解容易对许多词语产生误解。裘锡圭教授在讲述的过程中,从探求本义出发,大量联系出土文献和存世文献,不仅给师生们知识的启迪,也是治学的典范。他特别强调从事人文学科研究要有严谨的精神。会上听众们积极提问,就相关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裘锡圭教授平易近人的学者风范给广大师生留下深刻印象。

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沈家煊研究员 来我中心作学术报告

10月17日晚,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沈家煊先生在我中心做了一场题为“能性述补结构的不对称研究”的学术讲座。沈家煊先生现为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句法学和语义学研究。沈先生首先指出语言学要探求语言现象背后的四个规律:语言结构规律、语言演变规律、语言习得规律和语言使用规律。接着对汉语中表示可能的述补结构在肯定式和否定式上呈现的两种跨越时代的不对称现象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描述,并且用语用原则(“不过量准则”)和语用推理(“回溯推理”)以及意义虚化引起形式简化的规律对这些不对称现象进行了详细的解释。沈先生强调指出,语用原则和语用推理在汉语语义演变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可以解释许多语言现象。沈先生的讲座理论结合实践,深入浅出,使在场师生深受启发。讲座结束后,沈先生还与在场师生就一些相关的学术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沈先生那渊博的学识和儒雅的气质使大家深受感染。

美国加州大学马蒂索夫教授 来我中心作学术报告

世界著名语言学家、国际汉藏语权威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UC Berkeley)教授马蒂索夫(James A Matisoff),于10月24日晚在我中心作题为“东亚、东南亚语言里几种平行的语法化现象(Parallel Grammaticalizations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Linguistic Area)” 的学术报告。

马蒂索夫教授是国际汉藏语研究的权威人物，在汉藏语的同源研究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用流畅的中文对汉语中“来”，“在”，“了”等词的语法化现象作了分析，并列举了泰语，越南语与拉祜语中存在与汉语相对应的词语，并分别具有平行的语法化过程。而这些对应词的语法化现象的出现是由于汉语与周边语言长期而深入的接触而造成的。讲座结束之后，在座师生与马蒂索夫教授就讲座中的部分问题交换了意见，展开了热烈讨论。

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遇笑容教授 来我中心作学术报告

9月3日下午，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遇笑容教授来我中心作了题为《语言接触与汉译佛经的语言性质》的学术报告。中古的汉译佛经是汉语发展历史中，第一次有史可载的重要的大范围语言接触，无论是在词汇和语法上都对中古汉语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遇教授以汉译《撰集百缘经》为例，用汉文本和梵文本进行了对勘。发现中古汉译佛经在很大程度上对原文作了本土化的改造，而梵文原文对汉语的影响较小，语言接触并没有对汉译佛经的语言性质有质的改变。之后，遇教授介绍了自己学习梵文的经历，指出学习一点梵文对在中古汉语尤其是译经汉语研究中的重要性，并在在座师生展开了融洽而热烈的交流。

方一新教授、姚永铭副教授参加 “首届佛经音义国际学术研讨会”

由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主办的“首届佛经音义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于9月21日-9月22日召开，中（含港、台）、日、韩三国学者从各自的角度对佛经音义进行了探讨。我中心教师方一新教授、姚永铭副教授、研究生陈源源同学应邀出席了会议，并在大会上宣读了论文。他们的论文题目分别是：《读玄应（一切经音义）札记》（方一新）、《利用佛经音义补辑说文逸字应该注意的若干问题》（姚永铭），《妙法莲华经释文所引佛典“音义书”考》（陈源源）。

《孙诒让全集》编纂工作委员会 第三次工作会议在杭州举行

2005年10月12日至14日，“孙诒让全集编纂工作委员会第三次工作会议”在杭州柳莺宾馆召开。《孙诒让全集》主编许嘉璐先生主持了会议，编委会成员、工作委员会成员共21人出席了会议。作为《孙诒让全集》的副主编，本中心副主任王云路教授参加会议，并具体负责会议的日程安排及会务工作。《孙诒让全集》编委会顾问雪克教授，本中心副主任、《孙诒让全集》工作委员会委员张涌泉教授出席了会议。

方一新、张涌泉、王云路教授 参加“纪念《周礼正义》出版百年 暨陆宗达先生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

2005年10月15—17日，本中心方一新、张涌泉、王云路教授、陈东辉副教授参加了由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主办，杭州师范学院语言研究所暨汉语言文字学学科承办的“纪念《周礼正义》出版百年暨陆宗达先生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方一新教授提交的论文是《孙诒让〈墨子间诂〉评述》，张涌泉教授提交的论文是《“覞”字今义辨正——兼论《广韵》等韵书录存异说之例》，王云路教授提交的论文是《中古汉语研究领域的先驱者——以〈札迻〉为例谈孙诒让的中古文献研究》。王云路还应邀主持了大会闭幕式，并作了会议总结。会议期间，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召开了第七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王云路教授再次当选为中国训诂学理事会常务理事和副会长，方一新教授、张涌泉教授再次当选为理事。

陈东辉副教授赴韩国参加学术研讨会

2005年10月18—23日，本中心副教授陈东辉博士赴韩国国立釜庆大学参加了“中韩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他提交的论文题目为《俞樾与中日韩文化交流》。此外，他还访问了韩国龙仁大学。

王云路教授赴美参加 “第二届汉语史研究和汉语教学 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5 年 10 月 20 日至 10 月 26 日，王云路教授应邀参加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召开的“第二届汉语史研究和汉语教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王云路报告的论文题目是：《试谈韵律与某些双音词的形成》。王云路还应邀访问了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参观了图书馆等。此次应邀参加会议的中国大陆学者有 7 人，两年前的第一届学术会议受邀参加的大陆学者是北京大学的蒋绍愚教授和浙江大学的方一新教授。

张涌泉教授应邀赴美国讲学

应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邀请，本中心张涌泉教授 10 月 26 日至 11 月 9 日赴美国访问，并为密歇根州立大学师生作了《灿烂的敦煌历史文化》的学术演讲，受到好评。访问期间，张涌泉教授还偕同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安平秋主任、杨忠秘书长等走访了密歇根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斯坦福大学等知名高校，并与有关研究机构的学者进行了学术交流。

方一新教授参加 首届语言接触与汉语史研究国际研讨会

2005 年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3 日，方一新教授参加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二室和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东亚系合作召开的首届语言接触与

汉语史研究国际研讨会，并提交了《从译名看佛经的翻译年代》的论文，作了大会发言。

王云路、黄笑山教授等参加 “第五届中古汉语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5年11月3日至7日，第五届中古汉语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1月4日至7日在美丽的江城芜湖举行。会议由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举办。我中心王云路教授、黄笑山教授、陈东辉副教授、姚永铭副教授应邀出席了会议，并在大会上宣读了论文。他们提交的论文分别是：《中古汉语若干词语的考释》（王云路）、《三等韵ABC》（黄笑山）、《日本的汉语音韵学研究之历史与现状》（陈东辉）、《可疑的“今上”》（姚永铭）。

王云路教授应邀主持了一场分组讨论，并在闭幕式上作了分组会议总结发言。

方一新教授参加“中国古文献 暨纪念顾廷龙先生百年诞辰 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5年11月12日至11月14日，方一新教授参加了由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古籍所、华东师大古籍所合作召开的“中国古文献暨纪念顾廷龙先生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主持了一场分组的大会发言。

张涌泉、王云路教授 参加《古汉语研究》编委会

2005 年 12 月 2 日至 5 日，作为《古汉语研究》的编委，本中心张涌泉、王云路教授参加了在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召开的第三届《古汉语研究》编委会，会议就《古汉语研究》的内容栏目、来稿审读、质量把关等相关办刊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陈东辉副教授赴台参加清代学术研讨会

台湾中央研究院主办的“清代学术研讨会”，于 2005 年 12 月 7—13 日在台北举行。本中心副教授陈东辉博士应邀参加了会议，并作大会发言，题目为《诂经精舍与清代中后期浙江汉学》。此外，他还访问了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语言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和中正大学、东吴大学、故宫博物院等，并在中正大学作了题目为《关于古文献学的若干思考》的学术讲演。

王云路教授赴美国哈佛大学作学术访问

2005 年 12 月 10 日，王云路教授赴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进行为期 3 个月的学术交流和访问，期间还将应邀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和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进行短期的访问和交流，并作学术报告。

学术成果

张涌泉教授的博士论文入选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文库》(续编)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文库》(续编) 2005 年 2 月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本书主要收集 1994—2000 年在我国高校和科研机构毕业并获得博士、硕士学位者的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学位论文, 并适当兼顾 1994 年前相关之优秀学位论文, 凡 150 篇。入选论文由江蓝生、纪宝成等权威专家遴选确定。张涌泉的博士论文《敦煌俗字研究》的第三、四章《试论敦煌俗字研究的意义》(约 5 万字) 作为汉语言文字学方面的 6 篇论文之一入选。张涌泉 1994 年毕业于四川大学, 导师是项楚先生, 他的博士论文《敦煌俗字研究》1996 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此前曾评获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